

當代中國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吉隆坡 马来西亚
Kuala Lumpur Malaysia
Vol.4 No.1 April 2017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Volume 4, Number 1, April 2017

第4辑，第1期，2017年4月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社长
黄子坚

主编
潘碧丝

副主编
贺艳青 林德顺

英文编辑
张添财

行政主任
林燕萍

编辑助理
马瑛 朱锦芳

编辑委员会
李冉 张森

国际编辑委员会
(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华东师范大学

石之瑜
台湾大学

江柏炜
台湾师范大学

庄国土
厦门大学

李锦兴
马来亚大学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吴小安
北京大学

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

单宝顺
浙江理工大学

周建设
首都师范大学

饶兆斌
马来亚大学

袁兴言
金门大学

聂珍钊
华中师范大学

崔之元
清华大学

潘小慧
辅仁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airman

Danny Wong Tze Ken

Editor

Fan Pik Shy

Deputy Editor

He Yanqing Ling Tek Soon

English Editor

Peter Chang Tian Chai

Administrative Officer

Susie Ling Yieng Ping

Editorial Assistants

Ma Ying Choo Kim Fang

Editors

Li Ran Zhang Miao

International Associate Editorial and Advisory Board

Bo-Wei Chiang <i>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i>	Chih-Yu Shih <i>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i>
Cui Zhiyuan <i>Tsinghua University</i>	Lee Kam Hing <i>University of Malaya</i>
Ngeow Chow Bing <i>University of Malaya</i>	Nie Zhenzhao <i>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
Pan Hsiao-Huei <i>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i>	Shan Baoshun <i>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i>
Shen Zhihua <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	Shing-Yen Yuan <i>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i>
Wang Haiguang <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	Wu Xiao'an <i>Peking University</i>
Yang Xuedong <i>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i>	Zhuang Guotu <i>Xiamen University</i>
Zhou Jianshe <i>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i>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Volume 4, Number 1, April 2017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第4辑, 第1期, 2017年4月

©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First published in 2014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copi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1987,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z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shall be liable to prosecution and claims for damages.

The contents of a published articl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reflect the view of the author or authors and not that of the editors of the journal or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Cover Title: Dr. Lee Kean Yau

Typesetting: Wong Yee Chen

Printed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University of Malaya, Lembah Pantai,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Please visit the CCS homepage at <http://ics.um.edu.my/?modul=CCS>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is an academic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focusing on related issues about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Manuscripts for consideration and editori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sent to:

Edit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603) 79567288

Fax: +(603) 79565114

E-mail: ccs2014ics@gmail.com, chinastudies@um.edu.my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ntents 目录

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的当前学术气象与未来展望 / 王海光 The Current Academic Phenomenon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Wang Haiguang	001
声情入句与语言变异——以两岸语料库为本 / 陈菰霖 Analysis of the symbolism of Sound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Drawing on Cross-strait, China - Taiwan Language Repository / Chen Sunglin	025
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对中国的启示 / 高陆洋 The Promotion of 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a / Gao Luyang	047
中国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研究前景 / 王宇波, 谭昭 The Research Prospect of Discourse Diffusion of Chinese New Media Opinion Leaders / Wang Yu Bo, Tan Zhao	065
生态文明与哈尼族竜林文化刍议 / 赵德文 A Discussion On Ecology Civilization And The Hani Ethnic “Long Lin” Culture / Zhao Dewen	087



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的 当前学术气象与未来展望

王海光

内容提要:近年来, 中国大陆文革史的研究由于网络学术的发展、民间研究的兴起, 以及文革史研究的史源条件的变化、史观方法的更新和实证研究的开展, 开始了研究的学术化转型, 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增长点, 出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新气象。展望未来, 文革史研究的发展和对文革的彻底反思和清理需要宽松的外部学术环境也需要学者自身的刻苦自律, 并利用新的新理论、新史料、新方法, 努力构建一门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系统性的学科——“文革学”, 并使之成为对中国现代精神的反映与对现代文化的超越。

关键词: 文革史研究; 文革学; 史学史

作者介绍: 王海光,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他的主要著作有: 《旋转的历史》(1995年出版); 《从革命到改革》(2000年出版); 《林彪事件》(2012年出版)。

Title: The Current Academic Phenomenon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bstract: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et, increasing interests among the people, changes in historical assumptions and viewpoints, and advancement in research methodologies, have in recent years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how we researc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have contributed many new perspective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s to the field. Looking ahead, to develop further our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need a more open academic environment, individual scholars self

discipline and courage to apply new theorie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branch of learning, name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One that can be used to critically reflect on China's contemporary ethos and as a means to transce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Keywords: Studie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y; Revolution Studies; History of History Studies

Author: Wang Haiguang, is a retired history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e currently holds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Wang'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Rotation of the History (published in 1995),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published in 2000) and The Lin Biao Event (published in 2012). Email: <wanghaiguang@sina.com>.

经过文革史学者 40 年筚路蓝缕的艰辛研究过程，开始于平反冤假错案、起步于拨乱反正、发展于改革开放、开拓于二十一世纪的文革史研究进入了当下的新时代。这段“行走的历史”由于近几年来，网络学术的发展、民间研究的兴起，以及文革史研究的史源条件的变化、史观方法的更新和实证研究的开展，开始了研究的学术化转型，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增长点，出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新气象。

当前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有了一些新气象：¹

一、从追求历史“正义”转向追求历史真相

历史研究所关注的首先是事实真相，价值判断是退居其次的。传统的文革研究，出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正义”，甚至为了历史“正义”而不惜曲解史实。现在的文革研究，主要是

1 笔者在此借鉴了韩钢教授的归纳框架。见韩钢：《38 年来“文革”史研究的五点变化》，上海：《上海思想界》，2015 年第 10 期。

追求历史事实构建的准确，对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都一视同仁。对严肃的学者而言，他所从事的只是史实重建工作，并不涉及价值判断的立场问题。

学术研究是客观性的求真研究，没有政治评价的义务。无论研究对象是林彪、叶群，还是江青、张春桥，都与政治“翻案”无关。如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出版后，就有“文革史料学进入吴李邱时代”的说法，还引发了某些小众群体为林彪翻案的诉求。《张春桥狱中家书》²出版后，一些人也有“可与葛兰西狱中书简相媲美”的厚誉。但文革史学者还是持有比较冷静审慎的学术态度。如王海光写《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³，反对把学术研究与政治翻案搅和在一起。金大陆、金光耀两人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对其史料价值做了非常精到的评论和定位。⁴学界对于《戚本禹回忆录》⁵出版的史料价值，态度更为审慎和客观。

二、从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转向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

历史研究不能有先入为主的价值立场，不能是结论在前的按图索骥。传统的官方文革叙事，固然都是在《历史决议》框架之下的叙事，有价值先行的立场。民间的文革叙事也存在价值先行的问题，不仅也会有意识形态因素，更会有其情感好恶因素和现实利益立场。而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是为真求实的研究，没有预设价值立场的。

近年来，严肃的学者已有了不因人废史的学术意识，恪守事实真相的学术中道，不会刻意去搞道德评判的事情。如阎长贵的江青研究，并不以自己曾遭到江青的迫害而有意丑化她，而是实事求是地讲述了江青的工作、生活和性格特点，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江青

2 《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王海光：《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炎黄春秋》2015年7月。

4 金大陆、金光耀：《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炎黄春秋》2015年第9期。

5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

的脸谱化印象。⁶这种“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史家风范，在文革史研究中尤其难得。

三、从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转向多领域的研究

传统的文革研究，基本都是政治史、事件史，不仅质地单薄，还容易被误导。一些著述把文革历史搞成了一副“谴责史学”、“控诉史学”、“阴谋史学”的面孔。当前的文革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史领域，而深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领域。在经济、生活、文艺、诗歌、戏剧、婚姻、家庭等方面，都有新的成绩。如首都师范大学就举办过几次以文革中婚姻家庭为主题的研讨会。

文革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不仅有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方便，在学理上也很有必要性。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2011年出版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⁷一书，是从社会史角度写的地域文革史，内容丰富，学术质量很高。这是当局正式允许出版的第三部文革史专著。青年学者李秉奎研究文革婚姻的专著《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⁸，也是由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这些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的开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而且也为政治史的深化研究提供了更坚实的平台。

四、由单一研究主体转向多元研究主体

新传媒时代带来了文革史研究的开放性，谁都可以参加到文革史研究队伍中来。当前的文革史研究，不再是官方研究机构“一家独鸣”的局面，而是社会广泛参与的多重身份多种观点的齐唱。

现在文革研究者的身份非常复杂。在文革过来人中，有当年的政治风云人物，有被迫害被斗争的运动对象；有文革权贵人物，有普通工农兵群众；有群众组织的头头，有一般组织成员；有当年的

6 阎长贵对江青的研究，见《问史求信集》相关文章。

7 金大陆：《正常与非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8 李秉奎：《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红五类”，有当年的“黑七类”；有造反派组织成员，有保守派组织成员等等。在研究者中，有高级干部，有普通百姓；有专业工作者，有业余爱好者；有退休老干部老专家，有文革后的新人新手……。其研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个人回忆，有研究报告，有分析评议，有具体考证，有空泛议论……。尽管人们的经历背景不同，能力高低不一，认识差异很大，但都有参与历史叙述的平等权利。其实，文革是一场号称亿万民众参加的宏大运动，本身就是复杂的，只有在多元研究主体的状况下，才能呈现出立体的完整的历史相貌。

在多元研究主体的情况下，自印本成为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许多老人自己写的人生自传和回忆录，少量印刷留给家人和赠送朋友，这是自印本的由来。自印本因为没有审查一说，有些本子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情況，很有史料价值。也有自印本因为史料价值高，而变身为正式出版物的。如王光宇的《青史难隐》⁹，原本就是赠送友人的自印本。

从学科建设上说，文革史本来是中国当代史一个不成熟的幼稚分支，需要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参与建设。如周良霄、顾菊英夫妇本是治元史的著名学者，两人以70多岁的高龄，编著了一部名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大书，分为之一《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之二《十年文革中央首长讲话传信录》、之三《十年文革大事记》¹⁰。他们所做的，都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史学基础工作，为学界又提供了一套详实的文革史料集。

五、从当事人的回忆史学转向反思者的研究史学

现在，经历文革的一代人，最年轻的也开始步入了退休阶段。人生的黄昏期，有着回忆往事的情愫和感怀，是回忆史学的阶段。近年来的文革回忆史学，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参与者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领域，由讲清楚过去的事情，进而发展到反思自己和研究文革。其中，以文革时期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的反思活动最为

9 王光宇：《青史难隐》，北京：红旗出版社，2015年。

10 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

突出。北京是红卫兵的发源地。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在母校北京八中，以当年学生领袖身份，向文革受伤害的老师道歉。3个月後，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红卫兵标杆人物宋彬彬等人到母校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也为文革初期学生打死副校长卞仲耘的事情道歉。老红卫兵道歉的事情在社会上迅速发酵，许多当年的老红卫兵都表示了对过去的忏悔。¹¹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社会上关于红卫兵、“老三届”的话题很多。最早采访和研究北京中学老红卫兵的米鹤都，近年来又主编了《回忆与反思》的口述历史丛书，从2011年至今已出版了6本，口述者已有红卫兵、“老三届”的30多人。¹²

“老五届”大学生进入口述回忆和反思的时间比较晚，但质量较高。做得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参与者数量多，反思有深度。当年“团派”和“四一四”两派组织的人物，都有回忆清华文革的文本。许多人对文革的反思已经超越了过去派性。如“四一四”派的第二号领导人孙怒涛与炮制异端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纓，今天对文革的认识则是大不同了。孙怒涛的《良心的拷问》一书¹³，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反思文革；而周泉纓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¹⁴，则是基本肯定文革的解释。原“四一四”派的杨继绳近年来对文革史的研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烂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

11 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12 米鹤都主编的这6部口述史都是在香港出版，分别是：《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一》，《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难得本色任天然》，《光环与阴影》，《往事与尘埃》，《当时少年曾经狂》。

13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

14 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

权。”¹⁵ 这是近年来学界关于文革史研究很有影响的论点。

地质学院“老五届”学生对文革的反思，也颇有进展。已有了不同版本，可以对比校正。北京大学的“老五届”学生，也有回忆录出版。如樊立勤的《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¹⁶，有很好的史料价值。他们这些对过去文革岁月的反思，无论现在观点如何，都可以看作是他们心路历程的跋涉记录。这个思想变化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革的过来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文革情结，会不由自主地带入文革反思中来。如在群众组织头头的文革反思，基本都是原“造反派”组织的人。就可以看到这种情结。

六、从聚焦中央决策层和领袖转向 关注地方贯彻层和社会普通人群

现在的文革史研究已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拓展，开始从传统的高层文革史的研究，扩大到地方文革史和基层文革史的研究；从过去的聚焦高层转向关心底层、社会和普通人的命运。这是一个问题意识的转型。而文革本身是复杂的，决策了的东西未必能贯彻下去，各地文革的情况大不相同，各个单位的情况又不一样。所以，中央精神贯彻到了基层，不能不走形。只有打通了高层文革、中层文革与基层文革的相互联系，才能立体地呈现这段复杂的历史。

在文革通史研究方面，代表作有：麦克法夸尔、沈迈克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¹⁷、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¹⁸、史云、李丹慧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¹⁹，都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文革地方史方面，民间研究者更为活跃，已从事件史开始进

15 杨继绳：《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导论，五柳村网站，2015年7月7日。

16 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

17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18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入整体史，与官方地方史志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叙述。如：石名岗执笔撰写的《文革中的山西》²⁰，邓振新编著的《贵州风云》²¹，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²²等，都具有对地方文革史的全景性视角。这些地方文革著作，披露了大量官史遮蔽的历史细节，有的是作者个人观点，有的是作者所代表的一群人的观点。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文革研究者，也在私人撰写当地的文革史。

中央国家部委的文革史，现在也有一些民间私撰本，以外事口的成绩最大。已出版的有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²³、杨荣甲的《共和国外交部秘辛》²⁴等。中央调查部文革史也已有人撰写成书，自印出版。

从关注高层人物到关心普通人的文革命运，是把历史研究回归到人本身。只关注高层政治的历史是与世隔绝的历史，是远离民众的“达官贵人的历史”。只有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历史叙述才能成为“我们的历史”。在这方面，一些文革史学者已有了学术自觉。如金大陆关于上海一个普通高中女红卫兵红鸥命运的思考文章，就是一例。²⁵

在文革回忆录中，有些回忆家人文革遭遇的作品，感情真挚，细致入微，有很高的社会史和民众史价值。如周舵回忆母亲文²⁶，老鬼（马波）回忆父亲文²⁷。在历史匆匆过往的云烟中，最难留下的是情景和感受，时过境迁，后人很难体会到。而这类作品是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的。但这类作品是在白描中见思考，平淡中见功力，对作者的要求很高。在这方面，周舵的忆母文应是具有范本意义的。

20 石名岗：《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21 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年。

22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

23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24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25 金大陆：《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炎黄春秋》，2015年第7期。

26 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研究》，作者赠文。

27 老鬼：《我的父亲马建民》，《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

七、从以领袖人物中心的道德评判 转向对制度和文化的深层探究

研究文革与评价毛泽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决议》把毛一生与毛晚年做了一个切割，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关于晚年毛泽东的研究，王若水的遗作《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们眼中的伟人》²⁸，直接批评了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对当时社会上的毛泽东热进行了有力地解构。该书是自由派老干部评毛的最具学理性的著作，也可以说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后绝唱。可以说，以后的批毛者，虽有言论更激烈的，但在学理上鲜有超过者。

近年来，学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研究，已经走出权力斗争的分析框架。许多研究者把文革发生投射到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认识。王海光在《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²⁹一文中，提出要从三个时段来考察文革发生原因。一是从中国现代化的长时段，考察中国一百年来革命激进主义恶性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原因；二是从中共执政后的中时段，考察中国移植苏式斯大林体制中的内在矛盾冲突到极致的体制原因；三是从大跃进败局后的短时段，考察中共党内矛盾从分歧到分裂发展到极致的政争原因。唐少杰认为，文革的发生和出现，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起因：文革是中国古代千年历史的转型结果、近代百年危机的高度映现、现代中国数十年革命的总体折射、中共党内数十年斗争的凝聚体现。³⁰

在文革发生的制度原因方面，唐少杰具体指出了中共在1949年后建立的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七大制度”，即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城乡街居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业集体化制度、党管干部制度、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他认为：毛泽东直接驾驭群众运动，改变了“党权-政权-军权”关系，使军权独大。林彪事件造成文

28 王若水遗作，冯媛编：《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们眼中的伟人》，纽约：明镜出版社，2002年。

29 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香港：《领导者》，2013年第1期，总第45期。

30 唐少杰：《文革研究本身是中国政治的某种资源》，上海：《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第53页。

革最大的政治危机。³¹

李逊在其著作《上海文革运动史》中，阐述了体制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体制身份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制度的固化程度较高；政治身份是政治资源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制度弹性空间，进而提出了“政治名分”的概念，即个人可以通过政治表现的努力，获得某种政治名分，如入党入团或成为积极分子，来改变自己的政治身份，从而有可能改变体制身份。政治名分和所有体制身份之间的这种转换，成为政治运动的一种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个观点对理解文革发生的社会体制原因是很有启发性的。

大跃进失败与文革发生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年来，许多研究者把人事与制度、思想与行为、内政与外交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实证研究上理清了许多重要的史实细节。1980年代流行的“毛泽东帝王说”、“家天下说”、“权力斗争说”等偏重个人因素的文革起因诸说，现在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这样讲了。严肃的和理性的研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

八、从空泛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微观研究

近年来，文革史研究开始由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研究，由高层研究转向基层研究。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客观原因。因为国家档案的不开放，民间研究者无法利用，而口述史料又错误较多，缺乏对证性研究，会有成为历史演义之虞。所以许多文革研究者采取了眼睛向下的研究策略，从大量的民间史料中找寻研究课题，进行实证研究。二是主观原因。近年来，史学研究逐渐摆脱了宏大叙事的窠臼，转向了微观研究的天地。研究对象都非常具体，强调实证研究。这是历史研究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在这方面，国外学者的文革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都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对国内文革研究者是非常有启示的。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同仁们，收集了大量的上海文革史史料，做了大量口述采访工作，编辑出版了《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丛刊》，在学界已走到了前列。

31 同上，第29页；唐少杰：《应追溯历次转向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基础》，载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50页。

有的人批评微观研究是“碎片”、“局部”。其实微观个案都是与宏观背景有关系的，是要透过个案去反映这个时代。美国马里兰大学华裔学者高崢教授在介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时，曾针对性地讲过这个道理：“实际上，所有的认识和研究，都如同‘瞎子摸象’一般从局部开始，并受限于人类自身的或科学的工具。即便是用宏观的方法，截取大象的整体轮廓，也只是认识了大象的一个外观局部。只有积累大量细小的微观知识，才能达成较深入较全面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上，诸多局部研究的汇合，才是信史良史的长河。”³²高教授所言极是。实际上，坊间所谓的宏观史，其实不过是一种历史解释系统而已。许多东西只是意识形态的教科书。

另外，从效果上看，高层研究因为史料的封闭性，出现错讹的可能会更多。史云在《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一书中，曾批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在描写周恩来去世后的毛泽东，错用了不可信的网络传言。³³在高层政治人物中，由于作者占有史料与叙述逻辑间的缺环，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而微观研究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大众性民间史料的使用，需要研究者更敏锐的学术眼力和点石成金的学术能力，成果有着更高的学术稳定性。实际上，高层政治的历史叙述，因为史料的封闭性很强，是最容易搞成“历史演义”的，经常有人编造假史料，愚弄世人。当前在林彪事件研究的问题上，就是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出于某些个人目的，不断地制造和散布一些莫须有的“爆料”，试图欺骗公众，混淆视听。

这些年来，文革史在风雨交加中蹒跚前行，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艰难，但进步也是明显的。毋庸讳言，文革史研究的外部学术环境是相当严苛的，禁忌众多，困难极大，研究者不仅劳而无功，还要冒政治上的风险，没有一点精神是做不来的。所以，多数学人都奔着有课题、有项目、有资金、出成果、出业绩的研究领域去了。这就决定了从事文革史研究者，只能是小众群体。虽然体制环境对文革史研究的限制极大，文革史学科建设举步维艰，但总还是有一批不肯遗忘历史的人，愿意来做这件事，不离不弃，乐此不疲。最可喜的是，第三代文革史学者和第四代学者已经渐渐成长起来了，让

32 (美)高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读〈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兼谈美国的中国学范式》，《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

33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第604页，注45。

我们看到了薪火传承的希望。虽然文革史研究现在还是涓涓细流，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将来一定会成为百川归海的学术增长点。中国要想站立在现代文明高地上，就必须清理文革的历史遗产。在这里，只有华山一条道，是没有岔路口的。

而这种清理和反思的需求已经非常迫切。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基础上，已有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也积累了30年的政治社会问题。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发生了严重的撕裂，需要重建改革的共识。而重建改革共识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就是对文革的“彻底反思”，重新认识中国改革的起点，确立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发展路径。

展望未来，对文革的“彻底反思”，不是那种简单和肤浅的政治定性，而是从历史的长时段、社会的深层次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认真的检讨。不仅要反思文革的理论、文革的制度、文革的文化，还要反思造成文革的社会历史根源，更要反思当前文革左倾思潮回潮的背景原因。这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救赎和现代文明精神的再建构。

在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史的研究，不仅是一项学术工作，还有着以学术影响社会，以学术支持国家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的现实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只能来自文革研究的学术本位。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是没有生命力的。在这方面，政治化的“彻底否定”和“宜粗不宜细”的政治功利主义，正是历史的前车之鉴。在1980年代，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以后还会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坐大，还会有文革左倾思潮的卷土重来。这些实际上都是文革的负资产没有认真清理的结果。

文革遗留下来的负资产，最大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和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所严厉批判的“封建主义残余”，实际上讲的就是专制主义的制度和文化的。³⁴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按兵不动，不仅没有切割掉这个体制性的专制主义肿瘤，而且在改革开放中又以国家主义的面貌出现了，对以后中国的发展影响极大。文革中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就失去一切”的权力意志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以权谋私论，正是国内众多官员贪污腐

34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败的思想渊源。

文革研究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如果说学术是建立社会理性的最好工具，文革史则是学术工具中的最好利器。

“学术是社会公器”。文革史研究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求成为学术的“社会公器”。

但是，在可预期的时间里，文革研究的外部条件不会有所宽松，只会是越来越紧。2016年7月13日，国内能够发表文革文章的著名刊物《炎黄春秋》，被主管部门强行夺权。³⁵这一事件表明，文革研究也进入了“新常态”，现有的意识形态管制格局不会改变，体制不会给文革研究有任何开放空间，研究者还是要过“紧日子”的。

更重要的是，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下，是培养不出宽容精神来的。社会的极端情绪会继续发酵，过去撕裂的伤口会继续扩大，左右两端的分歧会进一步发展……，这些极端化的社会戾气，必然会反映到人们对文革的认识上来，给文革研究带来非理性的色彩。这是当前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2014年老红卫兵宋彬彬的公开道歉事件，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的，赞誉的，质疑的，谴责的，叱骂的，各种声音都有。宋彬彬再度成为公众人物，过去是老红卫兵杀人施暴的标签，现在是“红二代”虚伪逃罪的标签。不但左右两边都在骂，还把一些文革史学者也给捎带进去了。这里可以看到，文革给我们民族造成的伤痕是很深的，至今社会的戾气仍然还很重，缺乏必要的宽容态度。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文革史的研究是很有压力的。但正因为如此，文革史研究也可以成为理性的和解的学术中介。

真相是反思的前提，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文革史研究的还原历史真相，受到的外部压力要比其他历史研究更大，所以对学术道德的要求也更严格。

学术研究工作是以恪守学术本位的中道为职守，要有“不激不随”的态度和价值中立的立场。对文革史研究而言，这不仅是一种

35 2016年7月13日，《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管部门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奉令单方面撕毁与《炎黄春秋》32年前签订的协议，强行下令改组《炎黄春秋》编辑部，并派出一千人马到《炎黄春秋》编辑部接收印章、财务等。《炎黄春秋》编辑部成员据理拒绝。现在双方正在僵持阶段。此夺权事件有最高层背景，是近20年来最重大的文化事件。

学术研究策略，更是一个治史原则。文革十年，国无宁日，反复折腾，伤人无数，害人无数。人们不为施害者，即为受害者，往往还兼有两者角色。文革的是非恩怨纠缠纷乱，利害关系千差万别，派性观点莫衷一是……，这是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同样会反映到文革研究中来。

特别是，在文革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没有彻底清理的情况下，文革历史的沉淀又加上现实的社会矛盾，在文革研究中继续发酵，成为社会群体分裂的一个文化窗口。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许多关于文革的极端言论，仍然还停留在文革的阶级斗争年代。其思维方式的偏执，话语方式的粗鄙，意识形态的戾气，党同伐异的霸道，拉帮结派的狭隘，望文生义的无知，自信满满的粗浅，都可以看到文革反智主义的遗毒影响。所以，文革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学术工作，还具有建立社会理性的道德责任。

文革史研究在建立社会理性上的作用，表现为“去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公器”原则。即恪守真实性的科学原则，超越过去的是非恩怨，摆脱现实的政治屏障，建立专业化的学术规则和去政治化的学术自律机制，通过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以学术智慧引领社会舆论，逐渐弥合社会撕裂的创口。这就是文革史研究需要秉承学术中道的现实意义。

走出文革，最难的是走出文革思维。文革思维具有绝对化、简单化、暴力化、道德化、标签化的非理性特点，以制造圣人与魔鬼为能事，各种“替罪羊”层出不穷。文革中盛行一时的党同伐异的斗争哲学，政治挂帅的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革命大批判，打棍子扣帽子的恶劣文风等等，对现在的文革研究也有重大影响。

在当前的文革研究中，非学术化现象相当严重。如“翻案风”现象，为文革标志性人物翻案，寄予当下的某种政治诉求；“标题党”现象，题目空大无当，内容文不对题，语言夸张，逻辑混乱，误导和欺骗读者；“虚构党”现象，以商业化写作冒充历史研究，以文学创作冒充历史叙述，编造史料，虚构史实；“帮派史学”现象，以历史研究为名，搞党同伐异的小帮派，对不同意见群起攻之；“谴责史学”现象，以非此即彼的道德评价代替认真细致的学术研究，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化为黑白两道，罔顾史料的真伪，不分史实的有无，就以恢复历史的道德真君的面孔肆意评说。

这些非学术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文革学风，不讲史实，不讲道

理,以观点为取舍,拉帮结伙,党同伐异。这种恶劣学风与文革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家的观点,甚至编造假史料,捏造史实,故意制造混乱,有明显个人利益的企图。当前以林彪事件的研究最为集中。所以,在文革研究中,也有一个走出文革的问题。

清理文革文风,需要从史观开始。如“工具论”史观,是把文革史研究当做表达某种政治诉求,谋取经济利益的学术工具。这是过去“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当代版。其滥觞就是文革中甚嚣尘上的“影射史学”³⁶。

“阴谋论”史观,是把文革归因于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搞的政治阴谋,说成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的权力斗争,为了让江青接班而打倒刘少奇、逼走林彪。这实际上还是文革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观”的历史模式,没有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中脱胎出来。

“替罪羊”史观,把文革的罪错责任,归咎于某个或几个人物的道德品质问题,似乎把他们骂倒骂臭,就能给我们民族的众业赎罪了,也就能把我们自己给解脱出来了。官方史学是将文革诿罪于林彪、“四人帮”,而一些民间言论则是诿罪于毛泽东。其实都是同一个逻辑。该史观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忽视了对制度、文化、社会根源的深层次追问。以为文革寻找“替罪羊”的做法,而为自己寻求某种政治的或心理的解脱。

需要提示的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环境下,文革史的学科环境不会有大的改观,健康的学术发展平台一时难以建立,在文革史上的认知分歧会继续扩大,社会大众情绪会继续发酵,小众的学者群体必然势单力薄。这是文革史研究者的无奈和宿命,也是他们的责任与坚守。

今日的文革研究,处在危机与希望、艰难与出路、抑制与转化、矛盾与契机共生并存的局面。³⁷这是多年来文革史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今后发展的台阶。笔者认为,目前文革研究的学术化转型,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在存史、理路、交流方面还有很大不足,需要有海纳百川的存史工作、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理路、积

36 有关文革“影射史学”的分析问题,可见于余英时1981年写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一文,载于余英时著、李彤译:《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7 唐少杰:《研究文革的意义非同寻常》,《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

极的学术交流和健康的学术批评。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文革研究者对学术公器原则的坚守，能够创造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有规则的研讨环境。

第一，存史工作的问题。文革史以存史为第一要务。史料工作历来为学者重视，口述史料尤其为文革史家青睐。现在，一些学者已把主要精力放到收集整理文革史料方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理念。一部完备的资料集可以整体提升学界的研究水准，要比学者个人写一两本书更重要。

现在的存史工作，除了史料的发掘、收集外，整理和利用的问题比较突出。1、目前坊间大量的口述史料，虚虚实实，出入很大。所以，一是需要加强口述采访的规范性，提高口述史料的学术质量。二是需要对现有的口述史料进行学术梳理，通过去伪存真的校勘和鉴别工作，确定其史料价值。2、海外学界现在收集了大量的文革史料，这是海外研究者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这些材料大部分还是“原生态”，缺乏系统化的鉴别和整理，使用起来困难较大。3、国外史料系统方面，虽然已翻译了不少资料，但更大量的资料还没有翻译。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方国家有大量的档案资料，对从外部世界研究中国文革，是非常重要的。

在存史的理念上，应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存而不论的态度，尊重不同观点的历史叙述。历史的真相不是唯一性的，而是多种解释，多种史料，多种记忆，多种版本的共存。每个人都有讲述历史的平等权利。对存史工作而言，追寻的是事实的有无，而非是事情的对错。

第二，研究理路的问题。文革史是中国百年革命的顶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汇点，其复杂性是无以伦比的，所以就文革本身讲文革是难以深入下去的，必须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认识，运用更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去分析。过去的文革史研究，无论是阶级斗争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其基本点都是评判历史，历史叙述是单线条平面化的政治史框架，视野狭隘，观点刻板。现在的文革史研究的任务，则是要呈现出历史多面相的复杂性，展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全方位的立体的构建历史的叙述系统。这是需要更多的学科工具来实现的。

文革史的客体庞大、内容复杂，需要结合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才能有全面的展现和认知。但学界在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时，

水平差距很大。有些学者生搬硬套地使用一些学科概念的做法，这实际是一种取巧的做法，表面看起来花里胡哨，实际的知识含量不多。国外学者的文革史研究，小切口，大纵深，题目具体，分析深刻，背景知识广博，重视社会文化，是从微观的视角来透视整个时代，给国内研究者很有方法论启示。一些大学举行的小型工作坊会议，对促进国内外多学科的交流很有帮助。

在其他学科的文革史研究中，笔者比较推崇中国法制史学者徐立志对文革法制状况的研究³⁸。他的研究认为：文革时期不是“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破坏也没有严重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在出现破坏的同时，还存在着原有法制在“文革”环境下延续和强化的现象。不仅所有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都在严厉禁止之列，反革命受到严刑镇压；同时还按运动需要进一步强化了政治身份制度。这些看法，是文革史学者提不出来的，是很有启发性的。

第三，学术环境的问题。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需要有良好的学术交流机制和学术批评机制，为学术的发展起着激浊扬清的作用。但在文革史研究中，这是过于奢望的要求了。在学界小众与社会大众，国内研究与海外研究，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都存在着巨大制度性的阻隔，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致使一些错误的史实、造假的史料、虚构的伪作，野史类假书长期在坊间流传，影响了人们的历史知识。如报告文学作家师东兵，自称采访了许多文革政要人物，编写了文革系列的作品18本之多，号称“高层内幕作家”。2010年，数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师东兵的采访，斥之纯属造假，涉嫌诽谤。³⁹2010年9月，师东兵另因诈骗他人财物被判刑。此事可见坊间任意编造历史的乱象。

严肃的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不二法门。但在文革史研究中，健康的学术批评的开展是最为困难的。其一是缺乏一个理性讨论问题的公共平台。由于意识形态管理的原因，国内学术媒体一般都不敢讨论文革，更不敢讨论文革的境外出版物。而个别敢刊登文

38 徐立志：《“文革”时期原有法制的延续与强化——对文革法制及相关研究体系的重新探讨》，2015年2月，德国弗莱堡大学“数字人文与毛时代遗产”国际研讨会论文。

39 《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师东兵伪造高层党史》，《南方周末》，2010年9月14日。

革文章的网刊，又缺乏必要的学术识力。所以，文革的境外出版物成为了学术批评的盲点。有许多弄虚作假的伪作、错误百出的劣作。“标题党”现象也就这么来的。这些东西的错误其实很浅显，专业工作者通常不屑一顾，但对非专业人士就可能产生误导，所以评论它们也有必要。如2016年6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小型文革史会议上，参会的军史研究者就对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一书，从史料和史实的专业角度进行了批评，认为该书“历史事实不清且错误百出”。⁴⁰在历史研究中，学术评论起的是过滤网的作用。没有过滤的东西，质量是有疑问的。

其二是缺乏正常讨论问题的学术规范和程序。讨论程序这套东西，对中国人是很陌生的。人们熟悉的是文革中声势夺人的革命大批判，而不是讲求证据的学术批评。我们在网上到处可见，在讨论某个问题时，讨论者往往会越界发言，偏离讨论主题，不去就事论事，进行证据和理路的辨析，而是搞人身攻击，贴标签戴帽子，把学术批评搞成了革命大批判。批评者很难全身而退，经常还会搞出一场官司来。文革研究已经进入了“无义战”的战国时代。

笔者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2013年12月，笔者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批评报告文学作家贾舒云的《“九·一三事件”十大疑团》一文，涉嫌篡改史料、编造史料、虚构史实等学术不端行为。⁴¹随后，贾舒云和丁凯文联袂在海外媒体发文抨击笔者。⁴²贾舒云还把笔者与另一位批评者，在《炎黄春秋》发表批评文章的刘家驹老人，一并以名誉侵权为由告到了法庭。实际上，无论《中华读书报》，还是《炎黄春秋》都告诉过贾舒云，同样可以发表她的反批评文章。她完全是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的。

其实，在学术的平台上，这些无端之乱是很容易解决的。高层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时代的中心问题进行的，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事

40 徐金洲：《关于〈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一书的若干史实错误》，2016年6月11日，复旦大学《历史，政治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高端工作坊》，2016年6月。

41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北京：《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4日、11日。

42 舒云：《岂止不懂装懂，更是恶意诽谤——驳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丁凯文：《中央党校里的“帮派史学家”》，《新史记》2014年，总第18期。

情，都有确定的选择域界，是可以寻踪的。⁴³许多所谓“疑团”的问题，只需要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做一篇学术史梳理，搞一个大事记，事情大体也就清楚了。正如一句老话所说：“真理越辩越明”。文革史的深化研究，需要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才能真正开展起来。但这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无论外部条件如何，我们学者也都要有这种学术自律。

当前的文革史研究，已从评价性历史转到描述性历史。历史叙述的重点，不是去评论历史的功过是非，而是复原历史的现场原貌。评价性的历史是黑白照片、单色调的历史；描述性的历史是彩色照片、多层次的历史。描述性的历史旨在揭示更多的历史复杂性。过去一些脸谱化的、鬼神化的人物形象，在描述性历史中都要重新得到梳理。

文革的历史是20世纪最为复杂的中国历史。其发生的远因，可以追溯到中国革命的起源；近因又直接关联到大跃进的失败。外因有世界冷战格局和国际共运的共同影响，内因有领袖极权体制和左倾思潮的双重作用。而文革的发生，又把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释放出来了，使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数，运动的部署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出现节外生枝的事情。同时，在文革的动乱中，高层与底层，城市与农村，精英与群众，领袖与人民……，又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在不断地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多主体、多重奏、多声部的宏大历史场景，研究起来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文革历史时，就不能用黑白照片的单色调，也不能仅是正面人物的单一主体。在文革这部宏大的历史剧中，正角、反角、配角，领袖、干部、群众，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都要在现场，各有各的戏码，他们一起演出了文革这部大剧。笔者所说的构建文革史的多复线叙事结构，就是说要对文革有全方位的反映，构建出历史场景的全景图、揭示出复杂联系的因果链条。

文革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实在太深了，有些伤口现在还在滴血。可能在文革这代人身上，文革的创伤很难弥合得了。但如果我们能留下一部内容完整的、角色齐备、色彩斑斓的历史记录，相信后人

43 王海光：《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15日。

会更有智慧去破解文革难题的。

当前的文革史研究，已显露了一些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开始从宏大叙事走向实证研究，从高层研究转到底层研究，中观研究的开展，微观研究的兴起；论者遍及各地，不但说北京话、还说上海话、湖南话、东北话、山西话、贵州话、四川话……，形成了阵容强大的民间队伍。但是，当前的文革研究还有一些短板，许多方面轻重失衡，要做到历史的多复线叙事，立体地呈现文革的复杂历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简单说来就是：1、在高层与底层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传统的帝王将相史历史叙述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底层社会和民众的命运；2、在宫廷和百姓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宫廷政治的狭隘性，大历史是没有阴谋论的，历史叙述最有分量的还是普罗大众的历史；3、在国家与社会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国家决策主导、社会被动顺应的简单叙述逻辑，转为国家与社会在双向互动中不断调整的复合叙述逻辑；4、在精英和大众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精英阶层落难史的单一历史叙述，在文革中真正受苦遭难的还是底层民众，特别是政治贱民的“黑五类”们。多数精英也是从大众中产生出来的；5、在城市和农村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城市中心论的文革叙事，农村是文革史的重要内容，有许多特点。特别是城乡关系的内容非常丰富；6、在政治与生活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政治史的文革叙述，尽管文革搞的都是“政治挂帅”，实际上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活逻辑，政治史要与生活史结合；7、在特殊和普遍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过分强调文革特殊性的历史叙述，文革的特殊性与文革前的普遍性有密切的联系，两者不能割断；8、在非常和正常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偏重非常态化的文革叙述方式。史学家不是猎奇的新闻记者，大量处理的主要是常态的日常材料。这些常态的材料，具有社会结构性的意义。⁴⁴

从学理上说，文革历史的多复线叙事，就是以时代问题为中心的多主体、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多元化的历史叙述。笔者认为，今后的文革史研究，应是走专业主义的实证研究路线。通过史实研究来复原历史现场，揭示历史的复杂性，给社会提供接近真相

44 王海光：《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北京：《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

的摹本。从文革学科发展的状况看：高层政治史的研究，各种叙述相互矛盾，缺乏足够根据，需要扩大史源，解决的是史料问题。底层社会史的研究，民间史料丰富，可以说是史料横溢，驾驭史料的问题突出，解决的是方法问题。宏观研究，是多学科介入的长时段历史考察，解决的是理论问题。中观研究，是对社会制度框架和组织系统进行的历史考察，解决的是结构问题。微观研究，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的历史考察，以小见大地反映整个社会，解决的是个案问题。

现在文革史研究最大的瓶颈，自然还是政治对学术的管控。中国是一个重史的民族，著史传统悠久，各朝史籍汗牛充栋。以史为鉴，是历代政治家的典训。中国现政府也不断地在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但都是告诫他人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并不包括自己在内。这是把历史当成政治外交上的一个技术工具了。审视过去的政治得失，作为今天的资政镜鉴，这是历史最重要的政治功能。也就是说，历史最大的利益是提供自省和反思。但其前提是，这个历史必须是真历史。而这，正是政治家和史学家当前最大的矛盾和冲突所在。政治家的历史是从意识形态模型浇铸出来的历史，不符合这个模型的历史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史学家的历史，是准确反映历史真相的历史，不能反映历史真相的历史就是历史虚构主义。所以，前者搞的是价值判断，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就是否定历史；后者搞的是事实判断，是欢迎质疑的，越质疑就越能搞清楚历史真相。这些问题，在文革史研究中最突出。但是，历史是绕不过去的。遗忘历史，虚构历史，会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中国社会发生的问题，对文革教训的反思不够，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文革研究的最主要危机，还是在后继乏人的问题。文革研究的第一代人已经进入暮年，青年一代的研究者还在成长中。研究文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寂寞的，都会有一个学术志向与生活现实的矛盾问题。这就决定了，新一代的文革研究者，注定要比同龄人担负更多的压力。但只要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学术前途一定会是大放光明的。正如老历史学家周良霄、顾菊英所言：“研究文革，虽然在今天仍处文网厉禁，但在不久的将来，肯定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后，本文以唐少杰教授的话来表达学界同仁对文革学科发展

的共同期许：⁴⁵“文革学”应该是一门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系统性的学科，既立于文革历史，又高于文革历史，更是对于文革历史运动及其本质的理性审视和思辨把握。这种“文革学”交叉性地包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等学科的因素和方法。这种“文革学”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成为中国现代精神的一面自我之镜，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种自我超越。⁴⁶

参考文献

1. 韩钢：〈38年来“文革”史研究的五点变化〉，上海：《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
2. 《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王海光：〈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北京：《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
4. 王海光：〈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15日。
5. 王海光：〈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炎黄春秋》2015年7月。
6. 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香港：《领导者》，2013年第1期，总第45期。
7.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北京：《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4日、11日。
8. 王光宇：《青史难隐》，北京：红旗出版社，2015年。
9. 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10. 王若水遗作，冯媛编：《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们眼中的伟人》，纽约：明镜出版社，2002年。
11. 金大陆、金光耀：〈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炎黄春秋》2015年第9期。
12. 金大陆：《正常与非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45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前言，香港：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46 唐少杰：《文革研究本身是中国政治的某种资源》，《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

13. 金大陆：〈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炎黄春秋》，2015年第7期。
14.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
15. 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
16. 李秉奎：《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17.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
18. 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
19.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前言，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
20. 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研究》，作者赠文。
21. 周泉纁：《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
22.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
23. 杨继绳：《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导论，五柳村网站，2015年7月7日。
24.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25. 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
26.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27.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28.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29. 石名岗：《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30. 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年。
31.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32. 老鬼：〈我的父亲马建民〉，《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
33. 唐少杰：〈文革研究本身是中国政治的某种资源〉，上海：《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第53页。
34. 唐少杰：〈应追溯历次转向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基础〉，载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50页。

35. 唐少杰：〈研究文革的意义非同寻常〉，《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
36. (美)高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读〈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兼谈美国的中国学范式〉，《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
37.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38. 余英时著、李彤译：《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9. 徐金洲：〈关于〈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一书的若干史实错误〉，2016年6月11日，复旦大学《历史，政治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高端工作坊》，2016年6月。
40. 徐立志：〈“文革”时期原有法制的延续与强化——对文革法制及相关研究体系的重新探讨〉，2015年2月，德国弗莱堡大学“数字人文与毛时代遗产”国际研讨会论文。
41. 〈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师东兵伪造高层党史〉，《南方周末》，2010年9月14日。
42. 舒云：〈岂止不懂装懂，更是恶意诽谤——驳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丁凯文：《中央党校里的“帮派史学家”》，《新史记》2014年，总第18期。

声情入句与语言变异 ——以两岸语料库为本¹

陈菰霖

内容摘要: 本文所指“声情”是语言现象,透过不同的语音手法(拟声、谐音、音译)表达情貌的方式。文中以台湾华语为基调,透过新闻语料和两岸语料库 COPENs 和 BCC 分析词汇入句后的语法功能和词类语义分布,及词汇词法结构,并说明词汇出现的语域、言语社群、语言接触和词汇重整现象,最终揭示语言本体和语言运用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拟声; 谐音; 音译词; 词法; 词汇重整

作者简介: 陈菰霖,男,生于1978年10月。台湾政治大学语言学博士,师从曹逢甫教授、张郁慧教授。现职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研究语法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闽方言以及词汇语意学。曾在《汉语学报》、《海外华文教育》、《中国语文研究》、《南大语言文化学报》、《中国社会语言学》和《华语文教学研究》发表数篇文章。2016年获“中国社会语言学青年学者论文奖”三等奖。邮箱:linguistics.chen@xmu.edu.cn; Linggaga67@gmail.com

1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项目编号:11& ZD128)的资助,写作过程中获得了李英哲、汪国胜、屈承熹、周青海、曹逢甫、田小琳、完权以及林静夏等诸位教授的意见和指导,谨致谢忱!另本,文曾宣读于2016年两岸四地对比研究研讨会(成都)中得到杨文全教授、仇志群教授以及李行健教授等前辈的指导为本文增添文采在此一并致谢。又本文获得2016年“第十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青年学者”三等奖,感谢五位评委冯胜利、张振兴、黄行、赵蓉晖、戴红亮等诸位教授的意见。

Title: Analysis of the Symbolism of Sound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Drawing on Cross-strait, China-Taiwan Language Repository

Abstract: Sound symbolism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particular association between sound sequences and meanings in speech.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sound symbolism via onomatopoeia, homophony, and transliteration in Taiwan Mandarin, especially based on COPENs and BCC corpus. Particularly, we elaborate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sound sequences in discourse and the associated register, language community, language contact, and relexific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reveal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usage.

Keywords: onomatopoeia; homophonic; transcription; morphological; relexification

Author: Chen Sungli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He received his Ph.D. degree in Linguistics fro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Chinese phonology, historical linguistics, grammaticalization and etymology, and dialectology, from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He has been actively presenting papers on both research and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conferences. Email: <linguisticschen@xmu.edu.cn>; <linggaga67@gmail.com>

一、引言

“声情”一词广泛应用于文学、戏剧、音乐领域。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声情”一词通常指诗文韵律与作品情感之间的联系，如王易《词曲史》所言：“东董宽洪，江讲爽朗，支纸缜密，鱼语幽咽”，用以描述不同的诗文用韵所引发的情感联想。刘方喜认为“声情”是诗歌声韵形式功能的表现性或情感性（音可显情），也是情感表现的形式性（情以音生）。² 本文把“声情”的内涵界定为：“以不同语音手法（拟声、谐音、音译）表达情貌的方

2 刘方喜：〈“声情”辨——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文学研究》，2006年第六期。

式”，并以台湾地区华语为研究范围，透过新闻语料和两岸语料库（COPENS 和 BCC）搜集语例，分析这类以声音表达情貌的词语进入句子之后，在语法功能与词类、语义上如何分布，及其随语境变化而产生何种变异。

“拟声词”（onomatopoeia）也叫“象声词”、“拟音词”，作用是模仿人和事物的声音。³拟声只是借用其“声”使语言具“情”，增添生动、活泼效果，但不如名词、动词具体，传统上将拟声词归入虚词中。但有学者注意到，拟声固然是一种模拟，但入句后能承担语法功能。邵敬敏摘举拟声词入句的例子：⁴

- (1) 他噗嗤笑了一他噗嗤地笑了。
- (2) 叽叽喳喳的姑娘们跑过来。
- (3) 他在咕咕啾啾。

(1)-(2)带“地”和“的”标记，形成状语或定语。(3)是拟声当作谓语使用，搭配进行貌体标记“在-”。从上诸例可知拟声入句，必然建立在语句环境的基础上，不能只是个别单词。邢福义同样认为“拟音词”可以“句首独用”，如“碰碰碰！街口上传来枪声”，亦可“入句”当作定语，如：“他不禁发出唉呦唉呦的叫唤声”。⁵这类词语音表现不一，且受语用环境影响，并指出拟音词不应与名词、动词、副词等并立。

除了拟声入句，“谐音”（homophonic）与“音译”同样也可置入语句传情达义。刘大为认为“谐音”是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来表情达意的修辞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谐音背后的心理机制（联想、创造和模糊）及语言机制（语误、构式和编码）。⁶而“音译”顾名思义只是译原词的读音，而非其义。卢丹怀认为西方语言使用字母，故彼此间可用语音转写（transcription）。⁷像是英、法语言中彼此拥有对方的词语，体现了字母文字的便利。然而汉字是

3 邢福义（2004）：称为拟音词，其中包括叹词以及象声词两种。本文所称的拟声词，即包括此两类。

4 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5 邢福义：〈拟音词内部的一致性〉，《中国语文》，2004年第5期。

6 刘大为：〈谐音现象的心理机制与语言机制〉，《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5期。

7 卢丹怀：〈汉语中的字母词、音译词和混合语码〉，《外国语》，2010年第5期。

表义特征，所以产生了汉字表音的做法（例如：圣代 *sundae*，抬头 *title*，派对 *party*）。显然卢丹怀的说法不是基于汉字的形声作用而论，而是意指用汉字注写相近的读音。

本文随后将讨论方言谐音“543”、“2266”等和音译词“麻吉”、“嗨”入句后的语法表现和语体分布。

而所谓“入句”活用，邢福义、汪国胜认为：因为临时借用，将某类词改用于另一类词。⁸黄伯荣、廖序东的看法亦同，他们认为在特定的语境下为了表达需要而将词类转用。⁹其后各节将以台湾地区华语分析，揭示“声情入句”的语言学理论意义。

二、委婉拟声入句

除了上述“显而易见”的拟声词，有些拟声词却“隐而不先”，原因是委婉代用。像是“嘿咻”、“啾咪”、“虚”。从字形来看“嘿咻”是形声字，一般用以表达动作进行时所发出的呼喊声。但某些动作不便说出，只好以“拟声替代”，底下逐例说明：

- (4) 嘿咻真的能够瘦身吗？(GQ 潇洒男人网)
- (5) “寂寞星图”狂嘿咻，罗伯派汀森揭阴暗面。(联合新闻网 -2014-12-18)
- (6) 天天嘿咻女求分手(苹果日报 -2014-9-18)
- (7) 张三性欲强一天要嘿咻三次。(NOW NES-2012-7-13)
- (8) 如果另一半不喜欢嘿咻怎么办？(FHM)

(4)是“嘿咻”句首独用当作主语；(5)-(7)都是当作谓语，(5)受副词“狂”修饰表达狂热地“嘿咻”；(6)频率副词“天天”修饰动词“嘿咻”，表示经常性的动作；(7)则是谓语后带次数补语，显示动量；(8)作为动词“喜欢”的宾语。拟声“嘿咻”入句后展现“活用”的任意性，语义不再只是呼喊声，而是产生转移。除了在句中承担语法功能外，“嘿咻”也符合动词的部分特性。例如能带体标记、也能放入正反问句中，如下：

- (9) 中部大学生 50%已嘿咻过(苹果日报 -2013-8-9)

8 邢福义、汪国胜主编：《现代汉语》，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9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 (10) 别想那么多了,今天你嘿咻了没有? (东方财富网 -2014-10-9)
- (11) 实时亮点: 5 岁脱光躲厕所在嘿咻。(苹果日报 -2014-2-25)
- (12) 对年轻的男人而言嘿不嘿咻是蛮重要的指标喔!
- (9)(10) 分别带经验体标记“- 过”及完成体标记“- 了”。(11) 是搭配进行体标记“在-”表示说话的当时正在进行“嘿咻”的动作。“嘿咻”作为入句活用的动词,其语义呈现出动态性和持续性。(12) 涉及了词法问题,徐杰、田源称这类“A 不 AB”的句型称为反复问句,其特点是可以违反“词语完整律”(principle of lexical integrity)类型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方方言。^{10, 11} 此例将“嘿咻”分解为“嘿不嘿咻”,也就是语言用户自然地把“嘿咻”当词组看待,如同“幽不幽默”。再从词汇结构核心而论 Packard (2001) 提出“核心原则”(headedness principle) 即: 双音节的动词一定有个动词性成分在左; 名词一定有个名词性成分在右¹², 且可以透过“A- 不 -A”找出词汇中心语(head)。可见说话者显然已经把“嘿不嘿咻”的第一个“嘿”当作动词成分,同于“幽不幽默”成了离合用法。接续透过 BCC 和 COPENS 语料库¹³ 观察“嘿咻”的语体和语义分布。

表 1: “嘿咻”在两岸语料库的语体和比率对比

BCC 语料库 (词次 token)			
语 体	嘿咻拟声	嘿咻委婉	小 计
报刊	0	2	2
微博	487	513	1000
文学	128	149	277
比率	48%	51.9%	1279

10 该文主要论述“A 不 AB”和“AB 不 A”其句法生成来源一致。除了内文所提及“A 不 AB”的两项特点,还有一项是可以违反介词悬空原则,如“你把不把功课做完”。但本文并不讨论此特性,故未列入正文中。

11 徐杰、田源:〈“A 不 AB”与“AB 不 A”两种反复问句的统一处理及相关的句法问题〉,《当代语言学》,2013 年第 4 期。

12 中文译文来自石定栩写于该书中的导读。

13 BCC 语料库(北语汉语语料库); COPNES 是 Corpora Open and Search (开放语料库与搜寻工具) 由台湾大学语言所谢舒凯教授团队研发。

COPENS 语料库 (词次 token)			
语 体	嘿咻拟声	嘿咻委婉	小 计
儿童语料	2	0	2
BBS (PTT)	0	1320	1320
比率	0.16%	99.84%	1322

上表显示 BCC 中“微博”和“文学”将近 48% 保有“嘿咻”的原义，而委婉拟声的动词“嘿咻”出现在“微博”、“文学”、“报刊”三类语体共占 51.9%，能见到两种用法共存比率相近；对比 COPENS，委婉“嘿咻”动词高达 99.84%，完全倾向单一语义用法。

为此我们采用的解释是：Briton & Traugott¹⁴ 论及“词汇化”特质时，其中“渐变性”和“非组合性”可说明“嘿咻”成词的过程，即 BBC 是“渐变”的共存阶段，COPENS 则是完全成词的结果；而“非组合性”即语义和语用的习语化（idiomaticization），也就是词汇失去个别的语义成份，如“black market”既不是指市场也不是指字面上的黑色。据此，“嘿咻”不单纯只是字面上“呼喊声”的形声字，而有言外之意。其次，两个语料库中，尤其是“微博”和“BBS (PTT)”低变体语域均有相高的比例，相对来说高变体语域（报刊、文学）显得较少。由此足见两岸网民对委婉“嘿咻”动词具有一致性。刁晏斌¹⁵ 认为台湾“国语”的生动形式就是通过修辞性的词语借由比喻手法，用于动作行为及发展变化，对已有的词语做修辞使用，来追求并达到生动效果的。委婉拟声的动词“嘿咻”便是透过“声情”的比拟达到隐而不显的效果。

除了“嘿咻”还有一个词汇也是避免露骨的委婉表达——“啾咪”。“啾咪”是在他人或自身发文后，用以表达可爱、亲嘴的情貌。而且越来越多人将“啾咪”当作起始或结束的“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s）底下说明：

(13) 阿花¹⁶ 偷袭，啾咪李四 3 次。(奇摩新闻 -2014-12-19)

14 Laurel J. Brinton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 刁晏斌：〈台湾‘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中国语文》，2015 年第 3 期。

16 为了维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涉及人名者，男性一律使用张三、李四代称，

- (14) 阿花对李四想啾咪就啾咪。(中时电子报-2014-11-10)
 (15) 啾咪! 阿花候机楼主动啾张三。(壹周刊-2014-12-15)
 (16) 今天的我, 没有极限啾~啾咪。
 (17) 5 年级的女生, 在男子的脸上留下 100 个啾咪, 却引起对方女友不满。

“啾”属于形声字用以表达鸟叫声, 而人接吻的动作及声音与此相似因而借用。“亲嘴”、“接吻”的词汇色彩较直接透明, 相较之下“啾咪”、“打破”就显得生动活泼及文雅委婉, 同样也是声情具备的词汇。例(13)“啾咪”作为动词谓语并带次数补语, 其受事宾语是“李四”。(14)“想啾咪就啾咪”, 一般只有动作动词能放入“想 V 就 V”, 反之情状动词则否。例(15)(16)分别出现在“句首”和“句末”作为“话语标记语”衔接前后话语, 引发起始或结束谈话内容, 藉以达到语篇的连贯和谐。“啾”表示亲吻的声音, 日常口语可用以委婉称代亲吻的动作; “啾咪”则是源自网民的用语, 通常置于语句之开头或结尾, 作为话语标记语。分析“啾咪”二字的发音状态与听觉感受, 可体验到唇形由噘嘴到平展的变化, 且二字之声调均为可延长之高平调(高频能引发亲昵可爱的联觉), 故能用以表达亲昵可爱之情貌。其次“啾咪”离析后把第一个成分“啾”当及物动词看待后接受事宾语“张三”(啾+张三)。(17)是动词“啾咪”的名词化, 前面有数量值修饰可数名词。“嘿咪”与“啾咪”对照下, 谓语“啾咪”的动词特征不太显著, 因为在所寻的语料中极少见到与体标记(在-、-了、-着、-过)搭配, 只能就入句后呈现的语法功能作表述。

BCC 中“啾咪”共出现 40 笔且集中在“微博”, 其他的语体“文学”、“报刊”皆为零笔; COPENS “啾咪”共 621 笔也是集中在 BBS, 其他语体均未见。可见该词已经成为特定言语社群(speech community)的言语互动基础, 享有共同的语言符号系统¹⁷。透过语料库分析“啾咪”作为“话语标记语”的比例很高, 其次是动词、名词如表 2 所示:

女性用阿花。以下各例亦同。

17 徐大明:《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表 2：“啾咪”在两岸语料库的语体和比率对比

(词次 token) 语料库 / 语体	啾咪话语标记语		啾咪动词	啾咪名词	小计
	起始	结束			
BCC / 微博	31	6	3	0	40
CONPES / BBS	196	183	144	97	621
比率	34.34%	28.59%	22.2%	14.67%	661

何自然, 冉永平¹⁸、冉永平¹⁹指出“话语标记语”是话语信息组织的一部份, 对话语的建构与理解产生影响, 具有动态的语用特征。其功能是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 从而对话语理解起引导作用的程序性意义 (procedural process)。前例 (15) 起始语的“啾咪”触发听话者的注意, 引介后续陈述的内容“阿花候机楼主动啾咪张三”; 例 (16) 结束语的“啾咪”则是说话者对自述内容的肯定与确认。除此, BCC 显示微博还有起始语重迭式如: “啾咪 ~ 啾咪 ~ 夜宵完刚到家! 好开心啊”, “啾咪 ~ 啾咪怎么闹木 Q!” 主要功能是引起大家注意抢得话语权。而结束语则是避免话语突然中断填补缓和效果如: “终于可以去睡觉了, 现在外面只有 13 度呢 ~ 啾咪 ~ 大家晚安啰”。微博和 BBS 高比率地出现“啾咪”, 足见两岸网民求新求奇的特点, 在网络传播中形成独特的次文化。

前前述都是双音拟声, 接下来讨论单音节的“嘘”。感叹词“嘘”可用于表示制止如“嘘! 别出声”, 但入句后活用为动词谓语。

- (18) 仟情录后张三被嘘爆。(联合新闻网 -2014-11-2)
- (19) 栽在自己的场子张三站台被嘘。(中时电子报 -2014-11-4)
- (20) 嘘 killerag: 纯嘘下班不能准时走还要留下折纸袋。
(2014-9-17)
- (21) 看新闻学法律——网络嘘文当心被告。(法律热网 -2010-12-23)

上述诸例“嘘”表达反对、不赞同之意。例 (18)(19) 均出现在被字句, 其中动词为及物动词, 还带补语“爆”, 而被“嘘”的受

18 何自然、冉永平: 〈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19 冉永平: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 《外语研究》, 2000 年第 4 期。

事者是句中的主语“张三”。(20)是网络上的对话,第一个“嘘”是当及物动词后接受事者“killerag”形成动宾式;第二个“嘘”也是动词,前面出现副词“纯”表示单纯地、纯粹地排斥无法准时下班、还得继续工作。(21)的“嘘文”与“推文”相对,“推文”是网络上对某篇文章表示认可、赞同的说法,让该文置顶于最前,属动宾结构。同类可推“嘘文”是不认可、不赞同该文。该例意指,在网络上发表攻击性的文章会被告。大抵能说“嘘”是动词带宾语“文”和“推文”是类推。

相较上述两个词汇,“嘘”在两个语料库的语体和语义分布则较不平均。BCC里“嘘”在三类语体中总数为:“文学”(12998次)、“微博”(1457次)、“报刊”(17721次)。进一步检索“被嘘(含体标记)”分别出现的次数和比率为:“文学”(21次0.16%)、“微博”(153次10.5%)、“报刊”(5次0.02%)。而“(被)嘘爆”微博仅出现4次,其他文体均未见。相较下COPENS里“嘘”当拟声词在“儿童语料”(8次)、“口语语料”(1次)、“平衡语料”(1次)。而BBS则超过5000笔“嘘”,其中“被嘘”(1040次)、“(被)嘘爆”(1809次)两者都在被字句中当及物动词。除此,随机抽样1000笔“嘘”的动宾结构有514次;单独动词含带体标记407次(在嘘什么、尽管嘘、不能嘘);动补结构(嘘得C-嘘得半死、见一次嘘一次)43次;名词(每5嘘100P、一百人次的嘘、讨嘘)36次。透过两个语料库的对比,我们发现“嘘”的及物用法(至少在被字句里)在内地还未完全传播开来(如例18-20),只有特定的传媒(微博)偶尔可见。而台湾地区BBS里“嘘”的词类涵盖动词、名词、拟声、可置入被字句呈现弹性灵活样貌。

近期还有一个新生词“哔”同样也可当动词,例如“阿花狂轰张三飙脏话惨被哔音”,“到么是讲什么被哔掉呀?”,“哔”其实是动词“消”。“哔”本为哨音,多为警察或裁判用以禁止某种不当行为。因此,“哔”除了“消”的意义外,同时带有“禁止”的附加义。因此当电视上出现不当言论,媒体就会替代为“哔”声。但与“嘘”不同的是未见“哔”的动宾结构用法,或许假以时日语言用户为了创新,可能以“哔”替换“嘘”。

三、方言谐音入句

语言接触可经由邻界或移民产生，亦可由经济、文化交流而成。前者称为直接接触；后者为间接接触。²⁰ 据黄宣范和曹逢甫所做的社会语言调查²¹，闽南族群占台湾地区总人口将近 70% 以上，而具备双语（南岛语）、双言（闽、客语）的人占 82.5%。如此造就台湾地区华语丰富的样貌，包括外来语借词（英语、日语），以及方言词（闽、客语）、南岛语等。随着时间推移各族群语走进了传媒，形成常态的语码混合（code-mixing）现象。底下分别讨论两组闽南方言谐音“2266”、“543”和“A”、“Q”的入句活用。

“2266”在闽南语带有负面的语义表示“无规划”、“挂一漏万”、“良莠不齐”可作“零零落落”或作“离离落落”借其谐音“li-li-lak-lak”。用例如下：

- (22) 金门办铁人三项标示不清挨批 2266。(苹果日报 -2015-10-4)
- (23) 英文口说还是很 2266。(Yahoo 奇摩知识)
- (24) 胖达人强调天然被抓包后搞得 2266。
- (25) 连涨价也学人家也学得 2266。
- (26) 学校要冲国际排名加赚钱收一堆 2266 的老外。

前两例分别作为“铁人三项”和“英文口说”的谓形容词并受程度副词“很”修饰；后两例置入“V 得 C”结构当动词的结果补语。最后一例是当定语修饰名词中心语“老外”。由 COPENs 语料库所寻“2266”共计 261 笔，均出现在网民 BBS 的留言中，扣除数词 28 笔后其句式结构分布如下：

表 3：方言谐音词“2266”的结构比率

COPENs 语料库 (词次 token)				
语体 - 结构	结果补语 (V 得 C)	谓形容词	定语	总数
BBS (PTT)	129	64	43	233
比率	55%	27.5%	18.45%	98.68%

20 徐大明：《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1 黄宣范所调查的时间是 1987-1990 年，曹逢甫则是在 1994-1995 年。

表3显示“2266”当作结果补语的比例最高,其搭配的动词有“打”、“玩”、“扫”、“念”、“弄”、“讲”、“做”等动作动词;谓语形容词次之。再其次当定语修饰中心语“人”、“希望”、“烟火”、“司机”、“成绩”、“模样”等名词。对比BCC里仅在“微博”出现一例以“2266”作定语如:“这个2266的孩纸不去鼓浪屿文艺也枉然”其余都是当作数词。由此可见,方言谐音“2266”并未大规模的流传。另一组方言谐音“543”也是带有负面色彩,用以表示说话者“言不及义”谈话内容空泛信息量低,如下:

- (27) 我想休息好好的休息不要再用 543 的东西烦我。
- (28) 最好讲电话的时候不要讲一些 543 的话。
- (29) 不承认自己鲁还扯些 543 就很可耻。
- (30) 同学读完书一起去 pub 打屁聊聊 543。
- (31) 他讲话很 543。

前两例是“543”当定语修饰名词,出现在否定祈使的对话情境。可想而知,负面色彩的词汇并不符合一般人的预期,所以当然不期望发生;后两例则是当名词,量词“些”修饰不定数量的“543”,最后一例是形容词,描述说话的内容无趣无义。因受到区域限制“543”在BCC未见使用,仅在台湾地区通行。宽泛地来说上述诸例可属“社区词”一类。按田小琳²²的社区词内涵:反映本社区的社会制度,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词语,多半只在本社区流通。虽然她主张“社区词不是方言词,方言是汉语的地方变体”。然而,透过上面的数据显示这些词汇仅出现在特定的语料库里并不广泛通行,而且这些社区词也并未在同一方言区内流通(意指虽然福建闽南也是使用闽南方言,但这类方言数字谐音并不在该地流通)。接续谈以英语字母为方言谐音用例。

“A”是英语的第一个字母并未单独入句承担语法功能。但方言谐音借用其字形入句后当动词,表示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财务,相当于普通话“污”钱之意,如下:

- (32) 资策会员工勾结厂商 A钱 2人声押交保。(苹果日报
-2014-12-15)

22 田小琳:〈由社词词谈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语言建设》,1998年第11期。

- (33) 差点就被菜市场阿桑给 A 了钱。(痞客邦 -2008-4-10)
- (34) 张三: 若 A 过钱愿意坐牢。(中国时报 -2000-2-3)
- (35) A 不 A 钱没关系, 能办事就好。
- (36) 攸关人命的道路风灾抢修工程也 A。

上例“A”可作谓语动词带宾语, 或带体标记, 亦可出现在“V 不 V”里表示事件的陈述²³。最后一例副词“也”语带“甚至”起加强语气的作用修饰动词“A”。除了“A-O”动宾式, “A”也可组成动补结构。如下:

- (37) 到底是投资还是放着生利息, 还是 A 走了。
- (38) Hello Kitty 枕巾快被 A 光损失 1.6 万。
- (39) 我觉得真的从全民 A 太多。
- (40) 政府实在 A 很大。

动词“A”所带的补语可以是达到了某种目的的结果补语 (37)(38); 或是程度补语, 表示动词所达到的状态 (39)(40)。据 COPENS 所寻, “A”在“新闻通讯社”、“儿童语料”语体均做英语字母使用。可想而知, 此类语体要求规范性较高, 因此语义也相对受限。反之 BBS (PTT) 就能看到“A”各种用法(字母、序数、外来语)。在总数 374 笔“A”当动词中其结构分布如下:

表 4: 方言谐音词“A”的结构比率

COPENS 语料库 (词次 token)			
语体 - 结构	动宾式 (含带体标记)	动补式	总 数
BBS (PTT)	228	146	374
比率	60.9%	39.03%	99.93%

从上表可见, 动词“A”形成动宾结构最多, 特别是宾语属性都是有价物品“钱”、“房地产”、“餐券”、“补助”、“车资”、“健保”。前述“A”的动作带有贬意, 因此当与有价名词搭配时, 更能凸显其不法手段。至于“A”如何而来? 又如何产生。目前尚未定论²⁴, 但已有相关文献提出与闽南方言有关。王国

23 “V 不 V”被称为正反问句, 但邵敬敏 (1990) 和徐盛桓 (1999) 认为受到语用及交际语境影响, 还可以表示探询功能、陈述功能及指令功能。

24 百度百科上一种说法认为 A (buse) 钱 = Abuse (misuse) the money = “滥用

良²⁵做了简单考证指出“挨”字在闽南语读作“e”共有五个意项，其中表示从旁边碰到，当作动词（如：予竹篙挨着 e--tioh.（被竹竿拂到））。他认为从“旁边碰到”的语义引伸为财物被别人碰到，以旁门左道的方式获取财物。但因媒体未考证用字采用谐音字“A”，所以就形成一种习惯。我们进一步查证闽南方言，确实这个“A”与“挨”有谐音，即表达“靠近”、“接触”²⁶语义上具有引伸关系。然而因媒体语言讲求快速、生动、易于大众理解，所以就采用最简便的谐音方式。相较之下，另一个方言谐音“Q”的来历就显得不明。“Q”主要用于形容食物软嫩、弹牙。如下：

- (41) 我们都觉得他的干面很 Q 弹好吃。（桃园市特制汕头面-2014-10-8）
- (42) 那锅黑黑的超 Q 粉圆。
- (43) 自己动手做又香又 Q 的好吃黑糖糕。（妈咪部落格-2014-5-6）
- (44) 现在的面包越来越 Q，却也越来越不会发霉。

可以看到上述“Q”都是当作形容词使用，修饰食物类的名词。也可以置入并列复句(43)表示“香”和“Q”的情况同时具备；也可以放入递进复句(44)表示随时间增加而推进变化。同样的“Q”也涉及方言谐音及用字问题，而且说法也不一致。底下的观点可备一说，本文不做详细讨论。刘建仁²⁷认为表软嫩义的闽南语读音“k‘iu”与“糍”（去久切）有关。《周礼》“羞箴之实，糍餌、粉飧”，古代“餌”、“飧”都是饼类食物，类似现代的糍粑而“糍”作为形容“餌”、“飧”之软而韧之口感。而王国良参考了《全字库》却认为闽南语的“k‘iu”应与“食丘”或“食邱”有关²⁸。

公款”，“A”应该是指“abuse”。详细的语源尚待考证，但可备一说。

25 王国良：〈“Q 嗲嗲”的“Q”只能用英文写？〉，联合新闻网，2013 年。

26 林宝卿：《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辞典》，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7 刘建仁：《台湾话的语源与理据》，联合新闻网，2011 年。

28 部分学者指出这样的说法可能存在问题：《周礼》“糍”可作名词亦作动词。名词表示“熬米麦所成的食物”，动词表示“熬米麦”。“糍”并非古代形容口感之词。《周礼天官笱人》曰“羞箴之实，糍餌、粉飧”郑玄《注》“餌”“飧”皆粉稻米、黍米所为也。“合蒸曰餌，饼之曰飧”。“糍者，捣粉熬大豆，为餌飧之黏着，以粉之耳。餌言糍，飧言粉，互相

无论说法如何，可以确认的是这个软嫩义的“Q”确实与闽南语谐音有关，都是语言用户直接音读而成。此外，此类声情词发音时的肉体经验及其引发的心理联觉也有相关性。从身体联觉来看“k‘iu”的发音状态，舌体由前向后延伸、嘴唇则由开展转为聚拢，如此的发音动作（肉体经验）引发说话者的形象联觉，引发“弹性义”的联想。

近期这种软嫩义也逐步泛化修饰人体名词，表示体态“柔软”其语法功能不变，但语义从形容食物扩大到人体。如下：

(45) 好“曲折”的女人身体软 Q 到不可思议。(自由时报电子报 -2014-12-27)

(46) 腰骨真软 Q！张三春训练凌波舞。(奇摩新闻 -2014-2-5)

此两例“Q”的修饰对象不再是食物，而是“身体”和“腰骨”。方言文字借用了同音或音近的文字形式表达最贴切的读音，但其语义未必有直接关联。

四、音译词入句

音译是一种手段，它是用某语言的字母或注音转写到另一种语言中词语的读音，重新赋予新的书写形式以及语法功能。如早先的“humor”音译为“幽默”进一步离合为“幽不幽默”、“幽他一

足”。古代将磨碎的稻米、黍米蒸煮而成为饵，若捣成饼状则称为糍。这样的食物，黏性很高，要用磨碎煮熟的豆类粉末裹在外表，以避免沾黏（和今天麻糬的做法相似）。所谓“糍饵、粉糍”，郑玄说“饵言糍，糍言粉，互相足”，意思是“饵”“糍”都经过“熬米麦”的“糍”的过程，也都经过用粉末裹在外表的“粉”的过程。“互相足”表示省减不重复说同样的话。（“糍”，汉书王褒传“羹藜啜糍者”，颜师古注曰“即今之熬米麦所为者”。“糍”一般也指称干饭、干粮，是可以携带出门以备充饥的食物。）第二个是语音的问题。“糍”的“去久切”反映到闽南语并不读阳去 khiu7 的声音。按反切读的话，应该读 khiu2，是个上声调。音义两方面的材料都不能证明闽南语表示软韧口感的 khiu7 来自“糍”。除了上述两种“软嫩”和“柔软”义，COPENS 语料库查出还能借用“Q”的字形表达情貌 (Emotional) 符号或音近的英语词，如下：

a. 当时的六国鲁蛇崩溃哭哭 Q_Q。

b. 最近喜欢吃 G 腿饭，吃完去看了 Q 版电影。

第一例“Q”作为哭泣表情，第二例则是英语“Cute”（可爱）的谐音。因和本文论述的方言谐音不同，所以不列入正文讨论。

默”的动词用法。或是形容词“happy”进入正反问句形成“教师节黑不黑皮？”或是受否定副词修饰“快乐购信用卡不黑皮？”除此之外，还有“麻吉”和“嗨”接续说明如下：

“麻吉”是“match”的音译词，英语可当名词及动词，但进入华语后名词的语义转移为“知己朋友”。如下：

(47) 男烂醉同床女友被麻吉性侵。(苹果日报 -2014-12-6)

(48) 我的麻吉们已经登上联合新闻网首页。(联合新闻网 -2012-9-21)

(49) 我找一个好麻吉一起去捐助物资。

(50) SUM 尚麻吉的好邻居，秋季爱车健检大方送。

(51) 我们最麻吉俄国北韩发展全面关系。(苹果日报 -2014-11-21)

前三例是把“麻吉”当作名词，分别充当被字句的施事宾语以及带复数标记“- 们”的集体名词。可见“朋友”被“麻吉”取代了。例(50)(51)“麻吉”都是在句中充当谓语，均受带程度副词修饰。从词汇组合来看“尚麻吉”的“尚”是闽南语的程度副词即华语的“最”、“非常”，形成方言加音译词语码混合（code-mixing）的样貌。不仅如此，再从语言接触来看邹嘉彦、冯良珍²⁹认为，许多的外来词通过吸收、淘汰、调整，在华语中逐渐定形，有的词呈现新的定向趋势。或者在演变中不断地改变词形、词义衍生新词，这种过程可以称为“词汇重整”（relexification）。

“尚麻吉”采用华语的语法结构，而其词汇是不同的方言、语言合成，词汇重整后入句成为核心成分。表5 COPENs 语料库显示，“麻吉”共3265笔均出现在BBS里，词类分布集中在名词和形容词。当名词用的“麻吉”除了可后带“- 们”，亦可前接计数计量的“个”、“位”、“群”；形容词则可受程度副词“多”、“好”、“那么”、“蛮”、“真”、“超”、“更”修饰。

29 邹嘉彦、冯良珍：〈汉语（五地）与日语新概念词语对比研究——从新闻窗口看词汇衍生与重整〉，《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

表 5：音译词“麻吉”的词类分布

COPENS 语料库（词次 token）			
语体 - 词类	麻吉名词	麻吉形容词	小 计
BBS (PTT)	1742	1523	3265
比率	53.4%	46.6%	100%

然而，BCC 语料库中微博共出现 2280 笔“麻吉”但其语义和来源均不同。少部分是从英语音译词“match”引伸而来，略见几例是当形容词如：“心情有点不是很麻吉……惨了睡不着！”。为数较多的是受日语“マジで”音译的“麻吉”（mazi），用以表示意料之外的回应语“真的（吗）？”或是当作副词。摘举数例：

- (52) 快捷支付很方便都关两张卡了麻吉？
- (53) 某人明年会上剧吧，会吧会吧麻吉？红豆？
- (54) 真心爱诺基亚麻吉？真的假的！要我怎么接受这个事实啊？
- (55) 那个臭 PV 虽然说只有那么一句但是死抠不下来麻吉好闹心。
- (56) 每天能聊天也很开心了，话说这样下去麻吉会被人砍。
- (57) B 型白羊哦！我火气麻吉很大的。

前面三例是说话者对自身的反诘问题，表达不确定性，于话语结束时出现。后面三例都是当程度副词用以加强形容词效果。日语常用的反诘语“本当に？”（hontou ni?）是对上司或长辈的礼貌用语；而“マジで？！”（mazi de?!）比较直接，主要对平辈朋友。例 (53) 便是话语求新而雅俗混用。除此，“マジで”亦可当副词表示“真的”修饰形容词，如：“マジで 感谢！（マジでかんしゃ!）は”表示“真（的）感谢”；“マジで 恐怖”表示“真（的）恐怖”。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和网络用户迅速增加出现的了许多“网络语言”。我们询问了熟悉日本漫画的年轻群体，“マジ”“麻吉”（mazi）的出现，和日本的动画漫画引入有关。也就是语言用户的娱乐心态和仿效心理以表示情感上的交融和“趋同”（convergence）。

除了“最麻吉”、“好麻吉”另一个词也同样具备词汇重整的特性，即“嗨”是英语“high”的音译，常见的“自嗨”、“好嗨”等入句后当谓语使用。如下：

- (58) 主人选对玩具给狗玩，牠们就能自嗨啦！(ettoday-2014-12-5)
- (59) 张老师未婚，无不良嗜好，特色是常自嗨，笑声很有感染力。
- (60) 甄子丹新片伦敦首映粉丝超嗨。(联合新闻网 -2014-10-14)
- (61) 大家一起来看世足！今天好嗨！
- (62) 交换礼物大概是全场最嗨的时候。
- (63) 让人可以马上在派对上嗨起来的还是那几首经典乐曲。

“自嗨”是主谓结构也是华语和音译词的结合，表示自得其乐。除了搭配反身词“自”其他的代词都不能与“嗨”构成主谓式。按英语构词方式能用“self-”当作前缀并用“-”(hyphen)连接构成复合词如“self-denial”(自我牺牲)“self-conscious”(自我意识)。而“自嗨”结构上结合了华语型态的复合法，以两个语素构和而成并具词汇完整性(lexical integrity)，无法破坏或是替换内部成分成为固定用法，俨然“自嗨”已经成为一个复合词。(60)-(62)是“嗨”作谓语形容词且受程度副词“超”、“好”、“最”修饰，也是来源“high”的初始用法；“嗨”也能和补语“起来”组合表达状态起始貌如(63)。其他的例子像是“解嗨”表示扫兴、无趣如：“在欢乐的气氛下每个人都很嗨，你却容易把场面搞冷，这种解嗨王根本就是派对的天敌”。动词“解”表示免除、消除如：“解围”、“解闷”、“解渴”，但“解嗨”采用华语的词汇结构，置入英语音译词“嗨”而成“中西”融合。音译词进入华语后，不仅创造新的文字样貌，其语法功能也体现了“入境随俗”的现象。

以 BCC 所寻“嗨”出现的总数共 106120 次，在微博语料中可组合音译词“嗨皮”、“嗨森”、“嗨爆”等。我们以上述六组词统计比率如下：

表 6：音译词“嗨”的组合比率

BCC 语料库 (词次 token)							
语体	解嗨	自嗨	超嗨	好嗨	最嗨	嗨起来	小计
微博	34	1256	576	10413	1075	1502	14856
比率	0.23%	8.45%	3.88%	70.1%	7.24%	10.11%	100%

表6“好嗨”的频率最高，其次是“嗨起来”、“自嗨”。若以“嗨”出现的总数和“好嗨”相比其比率为9.8%（10413/106120），也就是每出现十次“嗨”中会有一笔是“好嗨”，可见该词在网络上具有高度的使用程度。“嗨起来”虽然远不如“好嗨”，但这两个词均体现人类情绪认知“happy is up”、“兴高采烈”、“情绪高昂”的概念隐喻原则（Lakoff & Johnson 1980）。

五、结语

本文从新闻及两岸语料库着手，讨论台湾地区华语词汇声情入句的现象，关注语言内部变异：词汇结构、组合关系及词汇“入句活用”后的语法表现；并论及外部变异：语域（高低变体）、语言接触、语言传播。归结底下三项理论意义：

1. 声情入句或代句：刘丹青³⁰以叹词（interjection）为例，认为叹词的本质是替代形式（pro-form），其功能是代替相应的特定话语功能的实义句子，包含陈述、疑问、称呼等可称为“代句词”，即具备“单词完整成句的信号”（holophrastic signal）³¹。周国光³²考察了叹词在句中的语法和语义功能后，直接称叹词是动词中的一类，可以叫做声音动词。而本文以“声情”（拟声、谐音、音译）为讨论对象，藉此呼应了此种入句替代现象，简洁直观地反映了声情的根本属性。

2. 言语社区与语言接触：有些词汇只出现在特定语体，为特定使用者所用如“嘿咻”、“啾咪”均广泛出现在两岸网民的微博和BBS里。另外，有些词汇是经由方言接触致使在语言使用时产生语码混合现象，如前述方言谐音类，而且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也有所限定。其次，与外来词接触后，透过音译手段引入本族语，而语言用户不自觉地将一些源语言（闽南语/华语）的词汇语义或句法特点附加在目标语（外语）词汇上，此过程称为“词汇重整”

30 刘丹青：〈叹词的本质 - 代句词〉，《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2期。

31 Poggi, Isabella. The language of Interjections. In A. Esposito et al. (eds.), *Multimodal Signals: Cognitive and Algorithmic Issue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9.

32 周国光：〈叹词的语法功能、语义功能及其定位〉，《语言科学》，2016年第15卷第3期。

(Relexification)³³。如“自嗨”、“尚麻吉”、“最麻吉”、“麻吉们”等。

3. 所谓的“入句活用”其实与 Hopper³⁴、陶红印³⁵、张伯江³⁶所主张“现出语法”(emergent grammar)是相同的概念。由此观之,语法的起源是来自于理解以及交际沟通,语法应从具体的语言运用来观察结构特性,解释成因以及了解结构的动态变化。本文不仅关注语言的词汇结构和组合关系,同时也论述词汇“入句活用”后的词法及语法表现已经跳脱词书、教科书所记载的固定范围,显示语言和交际的互动性。

参考文献

1. 曹逢甫:《族群语言政策》,台北:文鹤出版社,1997。
2. 刁晏斌:〈台湾‘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中国语文》,2015年第3期。
3. 何自然、冉永平:〈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
4. 黄伯荣、廖东序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 黄宣范:《语言社会与族群意识》,台北:文鹤出版社,1995。
6. 李如龙:《闽语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7. 林宝卿:《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辞典》,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8. 刘建仁:《台湾话的语源与理据》,2011,联合新闻网。
9. 刘丹青:〈叹词的本质-代句词〉,《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2期。

33 Lefebvre. Relexification in Creole Genes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ole. In Norval Smith and Tonjes Veenstra (eds.) *Creolization and Contact*. 9-42. Amsterdam: T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1.

34 Hopper, Paul J. Emergent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55-171, 1998.

35 陶红印:〈“出现”类动辞与动态语义学〉,《从语义信息到类型比较》,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1。

36 张伯江:〈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语言科学》,2005年第6期。

10. 刘方喜: 〈“声情”辨 - 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 《文学研究》, 2006 年第 6 期。
11. 刘大为: 〈谐音现象的心理机制与语言机制〉, 《当代修辞学》, 2012 年第 5 期。
12. 卢丹怀: 〈汉语中的字母词、音译词和混合语码〉, 《外国语》, 2010 年第 5 期。
13. 冉永平: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 《外语研究》, 2000 年第 4 期。
14. 邵敬敏: 〈拟声词初探〉,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1 年第 4 期。
15. 邵敬敏: 〈“X 不 X”附加问句研究〉,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0 年第 4 期。
16. 陶红印: 〈“出现”类动辞与动态语义学〉, 《从语义信息到类型比较》,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1。
17. 田小琳: 〈由社词谈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 《语言建设》, 1998 年第 11 期。
18. 王国良: 〈“Q 嗲嗲”的“Q”只能用英文写?〉, 联合新闻网, 2013。
19. 邢福义: 〈拟音词内部的一致性〉, 《中国语文》, 2004 年第 5 期。
20. 邢福义、汪国胜主编: 《现代汉语》,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1. 徐大明: 《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2. 徐杰、田源: 〈“A 不 AB”与“AB 不 A”两种反复问句的统一处理及相关的句法问题〉, 《当代语言学》, 2013 年第 4 期。
23. 徐盛桓: 〈疑问句探询功能的迁移〉, 《中国语文》, 1999 年第 1 期。
24. 张伯江: 〈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 《语言科学》, 2005 年第 6 期。
25. 邹嘉彦、冯良珍: 〈汉语(五地)与日语新概念词语对比研究——从新闻窗口看词汇衍生与重整〉, 《语言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26. 周国光: 〈叹词的语法功能、语义功能及其定位〉, 《语言科学》, 2016 年第 15 卷第 3 期。
27. George Lakoff, Mark Johnson. Conceptual Metaphor in Everyday Languag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77, Issue 8, 1980.
28. Hopper, Paul J. Emergent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8.
29. Jerome L. Packard.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Laurel J. Brinton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1. Lefebvre. Relexification in Creole Genes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ole. In Norval Smith and Tonjes Veenstra (eds.) *Creolization and Contact*, 9-4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1.
32. Poggi, Isabella. The Language of Interjections. In A. Esposito et al. (eds.), *Multimodal Signals: Cognitive and Algorithmic Issue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9.



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对中国的启示^①

高陆洋

内容摘要: 语言文化推广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事业的重点。韩国在推广语言文化等软实力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值得中国借鉴。在所谓“文化外交”的战略布局下, 韩流、韩国语、韩国学互相借力, 体现出韩国政府在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上的由浅入深、相互促进的战略思维。在具体的事业促进过程中, 多部门、多机构协同促进, “走出去”与“引进来”、“直接”与“间接”相接合的立体交叉式促进, 将侨胞纳入语言文化推广事业受益范畴, 以及相关法律保障机制健全等是韩国语言文化传播事业的主要战术特点。

关键词: 韩国; 中国; 语言文化推广事业

作者简介: 高陆洋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外语教育。邮箱: gao.luyang@163.com

Title: The promotion of 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motion is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Kore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revitalis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se are worth learning from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cro-cultural strategy “Cultural Diplomacy”, the Korean Wave, the Korean Language and the Korean Studies are interacting with another and moving

① 本文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东亚国家语言中的汉字词汇使用现状研究”(项目编号: 12JZD014)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项目“新时期东亚与中东区域大国全方位合作关系研究”的资助。

forward together, which reflects a progressive and mutual beneficial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 in the caus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motion. The Korean Cultural Diplomacy presents four tactical characteristics: concerted efforts of multi-sections and multi-agencies; an all-round promotion of "going out" and "bringing in", "direct" and "indirect"; sharing with overseas Koreans the fruits of the 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motion and a sound legal protection mechanism.

Keywords: Korea; China; Promo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uthors: Gao Lu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language's policy and planning; foreign languages. Email: <gao.luyang@163.com>

一、导言

在全球化时代,谁拥有了具备竞争力的文化,谁就拥有了影响世界的主动权。文化竞争力已经成为检验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文化同源性、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临近性等因素,使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战略上存在着较大的相互可借鉴性。中韩两国都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在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两国都重视通过语言文化的海外传播提升国际认知度,强化文化软实力建设,为本国发展争取更多的机会和空间。韩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在振兴本民族文化、开展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11 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亚洲竞争力报告》显示,在亚洲各国和地区综合竞争力排名中,韩国位居第一。韩国在行政服务效率、教育、信息技术产品出口能力、宏观经济环境、创新能力等方面均表现出优势。英国《Monocle》杂志于 2012 年发布的全球“软实力”调查结果也显示:韩国软实力居全球第 11 位,亚洲国家中居第二位,仅次于日本。

中国学者对韩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繁荣于两国建交之后,尤其是 2006 年之后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² 在对韩国文化软实力的外在考

2 李策,魏珊:〈中国学界对韩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述评〉,《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1 卷第 2 期,第 83 页。

察方面,中国学者对韩流和世宗学堂的发展情况,以及二者对韩国软实力和硬实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等情况,进行了较集中的考察。在对韩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分析方面,中国学者对相关政策的动机进行了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心理学等层面的分析,并对韩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模式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其成功经验和问题教训,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总结了借鉴性经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选取文化软实力建设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韩国政府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考察韩国在相关方面的“战略布局”和“战术特点”。并以此为基础,秉承“立足本土”、“为我所用”的理念,总结规律性认识,以期为中国文化传播事业提供参考。

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与文化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分属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政策范畴,在对象、目的、作用、影响等方面均有所区别:文化政策具有公益性,它通过政策手段来鼓励个人和团体进行自发的、自主的文化活动,为个人和团体排除客观不利条件,从而为其学习、创造、传达、享受、积累、交流等活动创造良好条件。文化产业的核心要义在于经济价值,将通过实现文化的产业化来追求商业利益作为其主要目标,其对象是文化产业的机构、经营及效益。本文虽涉及文化产业,但考察主体为文化政策。此外,作为公共政策研究,本文不将民间团体在语言推广事业上的努力作为考察对象。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的民间团体在语言文化的推广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如“韩文学会”等韩国民间学术团体就通过政府扶持和自身筹资等多种途径,与海外高校、培训机构等合作,举行演讲、作文比赛等活动,积极地促进韩国语言文化的海外传播。

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文化观光部³制定了“韩国语世界化促进计划”,2000年成立“韩国语世界化财团”⁴。这可以被看作是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获得国家全面政策支持的起点。2005年,韩国文化观光部出台《国语基本法》,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了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地位。此后的2011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

3 2008年,文化观光部更名为“文化体育观光部”。

4 2012年,经合并后改称“世宗学堂财团”。

外交通商部⁵又分别通过了《国际文化交流法》和《关于促进文化外交的特别法》。这一时期的政府相关部门网站的资料也显示出对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集中关注,以及政策思维的日益成熟。在事业预算方面,韩国政府也表现出对相关事业的高度重视。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为例,2010年,该部用于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经费预算为52亿韩元,比2005年增加了2.45倍;2012年增至150亿韩元,2013年进一步增至275.9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法律的逐步健全和政府预算的逐年增加都标志着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从20世纪末到目前的发展过程中,已在国家政策层面逐步走向成熟,进入了稳定发展期。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的时间维度定为20世纪末至今。

二、战略布局与战术特点

(一) 战略布局—文化外交

1 “文化外交”⁶的概念内涵

在韩国政府有关语言文化推广的政策体系中,“文化外交”与“国际文化交流”两种表述方式并存。2011年,韩国外交通商部和文化体育观光部分别通过了《关于促进文化外交的特别法》和《国际文化交流法》。自此,“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正式进入官方话语体系,外交部所主导的文化交流与推广工作被冠以“文化外交”的名称,而文化体育观光部则以“国际文化交流”作为相关政策名称。韩国学者以“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政策目标、政策内容等作为依据,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解读。李东尹(音译)指出,外交部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强调相关文化政策目标、内容等的“本国利益中心性”,而文化体育观光

5 2008年,更名为“外交通商部”;2013年,更名为“外交部”。文中统称“外交部”。

6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外交”一词由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特纳在其起草的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关系备忘录中提出,但他并未对这个概念给出确切的定义。卡明斯(Cummings)认为,文化外交是指国家及其人民之间通过信念、信息、艺术,以及文化的其他方面的交流,加强相互间理解。米切尔(Mitchell)从国际文化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国家政府所进行的对外文化关系就是文化外交。李智认为,文化外交就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

部则强调国际间文化交流和互动,强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⁷金辉廷(音译)则认为,“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这两个概念虽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实际内涵相似。他指出,文化体育观光部和外交部的语言文化推广工作有所重叠,内容相近,基本都是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对外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此外,教育部也担负了一部分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工作,并与上述两部的工作有所重合。⁸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调查也显示,政策专家和一般民众对“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的认识趋同,都认为两者无本质区别,其政策目的都是为了提升韩国的国际认知度,强化韩国的文化竞争力,进而提高韩国的国际影响力,在此目标基础上,其政策内容也颇有重复。⁹中国学者刘炳香对“文化外交”进行定义时指出,“文化外交”的概念与“外交”的内涵相联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外交指政府所从事的对外文化交流,与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构成国家外交体系;广义的文化外交是信息时代政府、社会组织、个人以文化为载体的对外交流活动,其目的在于促进于国外公众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还指出,韩国的文化外交是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和体现,其路径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¹⁰

结合国内外学界对相关概念的解读,我们可以形成较统一的认识:在韩国政府语境下,“文化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基本内涵,即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是同质的,是文化体育观光部、外交部、教育部¹¹通过发展对外文化关系,增进韩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提升本国国际形象、强化本国文化软实力的政府行为。为了叙述的统一性,本研究选择“文化外交”作为韩国政府发展对外文

7 [韩]李东尹(音译):〈韩国的东亚文化外交现况和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2集第2号,第208-209页。

8 [韩]金辉廷(音译):〈确保文化外交与国际文化交流部门协调功能的争论焦点和课题〉,《文化政策论丛》,2012年,第26集1号,第229-231页。

9 [韩]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旨在振兴国际文化交流的制度树立方案研究》,2007年,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第17-18页。

10 刘炳香:〈韩国文化外交:路径与启示〉,《当代韩国》,2013年第一期,第43-45页。

11 2008年,更名为“教育科学技术部”;2013年,更名为“教育部”。文中统称“教育部”。

化关系战略的统一名称，其内容涵盖外交部、文化体育观光部，以及教育部的相关政策内容。

2 “文化外交”组成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对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外交部、教育部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具体行政举措等进行梳理和分析后发现¹²，韩国政府的“文化外交”主要内容是：促进“韩流”（大众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海外传播，促进韩国语（文化的主要载体 - 语言）的海外推广，促进韩国学¹³（深层次文化研究）的海外发展。但这三个主要内容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三个并列主题，它们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是三个层次的文化事业之间的相互借力、共同发展，体现了韩国政府在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上的由浅入深、相互促进的宏观文化传播战略思维。

（1）“尖兵”——韩流

韩国于上世纪末逐步形成了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并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和稳定后，发展为今天的集中发展核心文化内容、具有韩国特色的文化产业政策格局。韩国在文化产业政策上的努力，促使其文化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韩国一跃成为世界文化产业五大强国之一。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国家在政策和资金层面的大力投入，令韩国的文化产业在海外获得了成功，韩国大众文化被世界各国不同年龄层的受众追捧，形成了“韩流”文化现象。¹⁴具体言之，所谓韩流是指韩国的大众文化商品在世界各国（中国、日本等东亚地区是韩流的主要流行区）被部分阶层所接受并成为流行的现象，它的形式包括电视剧、图书、动漫、音乐、游戏、电影、广告等文化

12 相关文献资料包括：[韩]文化体育观光部，《文化政策白皮书》，文化体育观光部，2008年；[韩]外交通商部，《文化外交指南》，外交通商部，2010年。此外，还有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网站（<http://www.mcst.go.kr>）、韩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mofa.go.kr>）、韩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kr>）等的相关内容。

13 广义的韩国学不仅包括了韩国的语言和历史，还涵盖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并结合历史和现实进行研究。在韩国的文化外交语境下，由于韩国语世界化事业的突出重要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往往将其与广义的韩国学加以区别，形成了狭义韩国学的概念，即除韩国语和韩国语教育之外的其他有关韩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14 李春虎，李钟洙：《韩国文化产业政策探析》，首尔：NPPLUS，2014年，第9-10页。

产业。¹⁵

韩流是以大众文化为主的韩国文化产业海外发展形态,是“浅层文化”的代表。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这种大众文化具有接触性强、受众面广的优势,易于打开文化传播的通路,是韩国文化外交的“尖兵”。韩流的成功,不仅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更令世界各国对韩国的印象得以改观。随着韩流的风行,世界各国渐渐对韩国生活方式、韩国精神、韩国风俗有了更多了解,对韩国的印象和认识更加具体,人们开始关注韩流、关注韩国,许多人成为“哈韩族”。

韩流的这种文化开拓者的作用,也同样体现在韩国语的海外传播上。仅以中国为例,据对北京和青岛部分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韩流对学生的专业选择确实产生了影响。在对“考大学之前选择专业时,多大程度受韩流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时,34.3%的学生回答“完全没受到影响”,42.7%的学生回答“受到一点儿影响”,13.5%的学生回答“受到了很大影响”。另外9.3%的学生则选择了“如果没有韩流,就不会选择韩国语专业”。综合这一数据,可知有大约占总数22%的学生因为受到了韩流的影响,才选择了韩国语专业。而且,据统计,当时韩国语系第一志愿者的比例已达到45.8%,这一数字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0%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其中韩流的影响不可忽视。此外,随着韩流盛行,大学中想学习韩国语的学生越来越多,随之许多大学都增设韩国语为第二外语课程。不仅如此,一些职业高中也开设韩国语作为第二外语课程,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山东省境内的沿海城市中,还出现了专门教授韩国语的私立学院。¹⁶

(2) “桥梁”——韩国语和“基底”——韩国学

韩流作为大众文化,是浅层次文化的代表。韩流生命力的维系仅仅依靠大众文化自身的发展是力不从心的。保持韩流的持续发展势头,离不开庞大的受众群体基础和深层次文化的厚重积累。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手段,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在韩国的文化外

15 金信同:《东亚各国的文化受容:对于媒体评论“韩流”现象的批判研究》,《韩国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辑,第298页。

16 金秉运:《韩流热潮与中国大学生的韩国语教育》,《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4期(总第105期),第171-173页。

交战略中, 韩国语处于中坚层级, 是连接浅层文化—韩流与深层文化—韩国学的重要桥梁。这种桥梁作用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 如上述调查研究显示, 韩流带动了韩国语的海外传播, 作为回报, 韩国语的海外传播扩大了韩流的受众基础, 强化了世界了解韩国文化的工具基础, 为韩流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 韩国语的海外传播也为韩国学扩大海外影响奠定了学科基础。有研究显示,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中韩之间的建交, 中国的韩国学开始兴起。80 年代末, 中国境内几乎没有综合研究朝鲜和韩国的研究所。虽然有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和吉林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所, 但是它们都只同平壤进行交流, 与韩国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在中韩建交前后, 中国沿海地区掀起了一股学习韩国语的热潮, 韩国学热潮也随后兴起。自那时起, 各级高校先后成立了韩国语系, 数所高校的韩国学研究机构也随之建立。此后, 中国的韩国学发展迅猛, 韩国学研究机构有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 而且韩国学的研究范畴也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得到了扩展。延边大学于 1989 年成立了“朝鲜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于 1991 年成立了“韩国学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和山东大学于 1992 年 10 月相继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和辽宁大学也于 1993 年创立了“韩国研究中心”。此外,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朝鲜 - 韩国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 延边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对外经贸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民族大学等高校也成立或者是组建了韩国学相关研究所。韩国学研究机构为增进中韩两国的学术交流, 为阐明东亚文明的整体性, 为促进两国的交流和友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¹⁷ 中国的情况表明, 韩国学的发展与韩国语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韩国语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了韩国学研究的进行。与此同时, 作为深层次文化研究, 韩国学则发挥了其基础研究的强大力量。韩国学的发展, 进一步加深了世界对韩国的理解, 也为韩流增强了厚重的文化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同时, 韩国学研究的对象包括

17 李德春: 〈韩国学 and 中国的韩国学〉, 《东疆学刊》, 2006 年, 第 23 卷第 3 期, 第 13 页。

韩国语,韩国学所使用的基本工具也正是韩国语,这也为韩国语的推广创造了科学依据和需求条件。韩流、韩国语、韩国学,作为不同层面的文化主体,在韩国文化外交的战略视野下,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互相借力,取得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

(二) 战术特点

在对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外交部、教育部的政策文献和具体行政举措进行梳理后发现¹⁸,韩国政府的“文化外交”事业呈现出四个主要战术特点:1、多部门、多机构协同促进;2、立体交叉式促进;3、侨民与侨胞全覆盖;4、法律保障机制健全。

1 多部门、多机构协同促进

韩国政府在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上采取了多部门分工协作的促进方式,以确保相关工作的全面性。在韩国政府内部,有三个部级单位是语言文化传播事业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分别是文化体育观光部、外交部、教育部。在具体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三个部级单位下属的8个机构担负具体主管和政策实施工作,它们分别是:文化体育观光部的国立国语院、世宗学堂财团、韩国文化海外宣传院;外交部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在外同胞财团、韩国国际协力团;教育部的国立国际教育院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此外,在8个机构之下,还有5个具体的政策执行机构,它们分别是:文化体育观光部—世宗学堂财团的世宗学堂、韩国文化海外宣传院的韩国文化院;外交部—在外同胞财团的韩文学校;教育部—国立国际教育院的韩国学校和韩国教育院。这种多元化机制是文化外交事业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的体现。¹⁹

2 立体、交叉式促进

尽管语言文化传播事业的核心要义是将本国的语言文化传播至海外,增加它在海外的影响力,其“主战场”和“主要目标”都在海外。但韩国在具体事业促进过程中,没有简单地将其定格为单向

18 相关资料包括:[韩]文化体育观光部,《文化政策白皮书》,文化体育观光部,2008年;[韩]外交通商部,《文化外交指南》,外交通商部,2010年。此外,还有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网站(<http://www.mcst.go.kr>)、韩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mofa.go.kr>)、韩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kr>)等的相关内容。

19 具体情况参考附录(1):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相关机构概况

性的“走出去”，而是采取了“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策略。所谓“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是指既走出国门，到对象国去开展语言文化推广，同时也将对象国的人员邀请到本国来，让他们在韩国感受韩流，接受韩国语教育，为他们提供参与韩国学研究的机会。此外，韩国在开展语言文化推广的过程中，还采取了“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策略。所谓“直接”，是指韩国政府直接开办诸如“世宗学堂”、“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等直属性教学和研究机构，对教学和科研进行直接的管理和运营。这种“直接”的做法能够保证推广效果的最佳化，但也存在文化传播意图过于明显，引发文化抵触等逆反效果等问题。此外，凡事“亲历亲为”、“事必躬亲”也不符合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效率原则，不利于文化推广的高效发展。因此，韩国在“直接”推广的基础上，还配合进行“间接”推广，即不直接参与教学与科研，而是通过出资或派遣专家学者，支援对象国的韩国语和韩国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他们提供各种奖学金、研究经费等资金支持，提供教学和学术研究所需的教师、专家等人员支持，以及必要的学术后援等工作。仅以韩国外交部下属的政府财政支援机构—国际交流财团为例，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海外大学的韩国语教师、韩国学专家、韩国语学习者（本科生及研究生），工作内容主要是通过出资援助的方式，在海外大学和学术机构设立韩国学教授职位，开办讲座，举办学术研讨会，援助出版韩国学研究资料，举办国际会议，邀请海外韩国语教师和学者赴韩研修，以及援建海外博物馆开设韩国馆等。2014年，该机构在相关事业上的资金投入逾1000亿韩元²⁰，约合6亿元人民币。

3 侨民与侨胞全覆盖

韩国的侨胞被称为“在外同胞”，根据韩国《在外同胞法》的有关规定，“在外同胞”包括两类人：1，拥有韩国国籍，短期或长期居住在国外的韩国人，又称“在外国民”；2，曾经拥有韩国国籍（包括1948年韩国政府建立之前旅居国外者）现已取得他国国籍者，以及他们的已取得他国国籍的子孙，又称“外国国籍同胞”或“海外韩人”。可见，韩国“在外同胞”的概念是宽泛的，既包括侨民，也包括侨胞。模糊侨民和侨胞的区别，将二者置于

20 参见：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官网公开数据 <http://www.kf.or.kr/?menuno=468>

“在外同胞”这一宽泛的范畴内，使其与“国内同胞”相对应、相联系，是韩国政府民族政策的一大特色。这种政策理念源于加强所有形态的韩民族成员与祖国的联系，保持和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向心力的政策意志。

在这种政策理念的影响下，韩国的语言文化传播事业并没有把受众简单地定位为“外国人”，而是考虑到团结世界范围内的韩民族成员，将侨胞也纳入文化外交事业的受众范围。因此，不仅有韩文学校、韩国教育院等专门机构负责侨胞的语言文化教育，世宗学堂等主要面向外国人的教育机构也向侨胞开放，为他们提供语言文化教育服务。截至2014年12月，世宗学堂财团在世界54个国家，设立了130所世宗学堂，统计当时的听课人数逾4万²¹，据不完全统计，其中超过十分之一的学习者是侨胞。²²

4 法律保障机制健全

法律法规一方面规范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一方面为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保障和支持。韩国政府重视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法律法规建设，文化体育观光部和外交部分别出台有《国际文化交流振兴法》（2011）、《国语基本法》（2005）和《关于促进文化外交的特别法》（2011）、《在外同胞财团法》（1997）等专门法，以保障文化外交战略的顺利实施。教育科学技术部虽尚没有专门法，但其组织制定的在外国国民教育等法律中也对语言推广等事业的相关内容作出了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完善，确立了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作为独立的政府促进事业的地位，使它真正成为韩国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为韩国文化外交战略的目的性、任务性和可操作性提供了保障。

三、启示与建议

（一）发挥大众文化产业的“尖兵”效应

韩国认识和发挥了大众文化产业为语言文化推广事业“开疆拓土”的作用，充分利用浅层文化代表——“韩流”的接触性强、受众

21 参见：[韩]世宗学堂财团：《国外韩国语教育机关现况调查》，世宗学堂财团，2015年，第30页。

22 暂未获得韩国官方的具体统计数据。本数据是在世宗学堂财团有关人士的估算数值。

面广的传播优势,为语言文化的深层次传播奠定了民众基础,促进了韩国语和韩国学的发展。

中国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也应着力利用大众文化的“尖兵”效应,为汉语的国际传播更高效地开拓发展空间。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文化推广事业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我们应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开发大众文化元素,并将这些文化元素体现在中国影视、娱乐等大众媒体活动中。我们要与国际接轨,适度考虑国外民众的文化倾向,创造容易为外国大众所接受的中华文化作品,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学习汉语,关注中国文化。

(二) 认识政府多元管理体系的利与弊

韩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涵盖了3个部级主管单位和8个下属机构以及5个直接政策执行机构,这种多元化的促进机制是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多元性、多层次性的体现和需要。各机构在明确各自主要职能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工作的高效性和政策实施与支援项目执行的准确到位。但是这种多元体制在具体施政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弊端。据相关研究显示,负责语言文化传播事业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业务分工不甚明确,且缺乏专门负责或统领全局的权威机构,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不甚理想,以“各自为政”为主,致使各部门之间权责模糊、分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把事情做大、做精。而且各机构业务之间存在的重复现象,对政府资源也造成了一定的浪费。²³因此,建立健全相关部门、机构之间的协调统一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的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也是多部委、多部门协同促进的战略事业,这种事业结构要求我们清晰认识它所存在的利弊因素,加强分工合作机制,加强协调统一管理,保障相关部门在精准定位自身工作重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高效完成任务。

(三) 扩充语言文化推广的形式和途径

韩国在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中采取了“立体交叉式”的推广形

23 [韩]赵恒禄:《韩国语教育政策论》,首尔:韩国文化社,2010年,第363页。

式,即“走出去”与“引进来”、“直接推广”与“间接推广”相结合的策略。这种立体交叉方式一方面能够从某种程度上消除国家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文化传播意图过于明显而引发的文化抵触等逆反效果,一方面也符合效率原则,保证了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中国的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代表性机构—孔子学院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遭遇到了一些困境,其中就包括对孔子学院办学目的的误解和语言文化推广方式的误解。文化传播互动机制匮乏、设立机制与运行方式呆板、对语言文化推广政策的研究不足是导致这种阻力的主要原因,而其中的“官方化”和“官腔浓厚”是主要症结所在。²⁴结合韩国的经验来看,中国的相关事业也应积极扩充语言文化推广的途径和方式,通过官方的、非官方的、直接的、间接的等多种途径,让世界接触、认识、接受我们的语言文化。如在进入对象国开展语言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将对象国的人员邀请到中国来,让他们在中国接受汉语教育,为他们提供参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机会。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出资或派遣专家学者,支援对象国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为他们提供奖学金、研究经费等的资金支持,提供教学和学术研究所需的教师、专家等人员支持,以及必要的学术后援等,从而间接地促进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

(四) 重视侨胞在语言文化推广事业中的意义

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对象不仅包括外国人,也涵盖侨胞,并且力争做到只要有侨胞的地方就有韩国语教育,这是韩国语言文化推广的一大特色,也取得了既有效传播文化又紧密团结民族的“一石二鸟”效果。

中国在全球拥有约3400多万的海外华人,汉语是联系他们感情的纽带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华侨重视子女的汉语教育,希望其子女学习汉语,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希望藉此搭乘“中国机会”的列车,在将来的发展中赢得更多机会。尽管近年来我们已经越来越重视海外华文教育,国务院侨办等涉侨机构也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海外华人子女的汉语水平仍然相当薄弱,海

24 刘扬:《境外孔子学院语言文化传播的困境及对策》,《新闻世界》,2013年,第4期,第293页。

外华文教育仍然任重道远。

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汉语国际推广与海外华文教育历来有着平行交错的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孔子学院的汉语言国际推广事业主要面向母语为非汉语的外国人群体，并未将海外华侨纳入教育推广体系之中。如何借助孔子学院的发展推动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是在世界汉语热背景下华文教育应关注的课题，而充分利用海外华文教育资源的优势也是孔子学院汉语国际推广课题中的重点之一。²⁵

（五）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

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拥有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相关各部均出台有专门法或相关法，这些法律对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对象、工作内容、实施办法、奖励制度等有明确的规定，使得韩国的语言文化推广有法可依，这是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得以顺利、稳定、持续开展的根本保障。

当前中国的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发展迅速，但在汉语国际推广方面尚未出台任何专门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等事业做出了规定，但基本上未涉及汉语国际推广方面的内容。政府应制定加强语言文化推广的相关法律法规，这是将语言文化推广事业提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保障，是确保中国语言文化推广工作的持续、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

25 周聿峨，罗向阳：〈论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国汉语推广〉，《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总第222期第6期，第120页。

参考文献

1. 金秉运:〈韩流热潮与中国大学生的韩国语教育〉,《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4期(总第105期)。
2. 金信同:〈东亚各国的文化受容:对于媒体评论“韩流”现象的批判研究〉,《韩国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辑。
3. 李策,魏珊:〈中国学界对韩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述评〉,《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1卷第2期。
4. 李春虎,李钟洙:《韩国文化产业政策探析》,首尔:NPPLUS,2014年。
5. 李德春:〈韩国学 and 中国的韩国学〉,《东疆学刊》,2006年,第23卷第3期。
6. 李智:〈试论外交文化〉,《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7. 刘炳香:〈韩国文化外交:路径与启示〉,《当代韩国》,2013年,第1期。
8. 刘扬:〈境外孔子学院语言文化传播的困境及对策〉,《新闻世界》,2013年,第4期。
9. 周聿峨,罗向阳:〈论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国汉语推广〉,《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总第222期)。
10. [韩]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旨在振兴国际文化交流的制度树立方案研究》,2007年,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
11. [韩]金辉廷(音译):〈确保文化外交与国际文化交流部门协调功能的争论焦点和课题〉,《文化政策论丛》,2012年,第26集1号。
12. [韩]李东尹(音译):〈韩国的东亚文化外交现况和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2集第2号。
13. [韩]世宗学堂财团:《国外韩国语教育机关现况调查》,世宗学堂财团,2015年。
14. [韩]赵恒禄:《韩国语教育政策论》,首尔:韩国文化社,2010年。
15. J. M. Mitchell, *International Culture Relations*, London: Allen & Unwin Ltd, 1986.
16. Milton C. Cummings, *Culture Diplomacy an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 surve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rt and Culture, 2003.

附录(1): 韩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相关机构概况

主管部门	执行机构	方式特点	实施机构及举措	网站	法律法规
文化体育观光部	国立国语院	间接的	开展韩国语研究, 提供相关政策咨询和国语本体、教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和教材开发等支持	http://www.korean.go.kr/	《国际文化交流振兴法》(2011) 《国语基本法》(2005)
	世宗学堂财团	走出去 直接的	世宗学堂 面向外国人、侨胞, 提供非学历韩国语教育	http://www.ksif.or.kr/	
	韩国文化海外宣传院	走出去 直接的	韩国文化院 面向外国人、侨胞, 开展韩国文化宣传和学历韩国语教育	http://www.kocis.go.kr/	
外交部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	走出去 / 引进来 间接的	面向开展韩国语与韩国语教育研究的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 通过派遣教授和约请人员来韩培训, 以及提供奖学金、研究经费等方式, 促进韩国语和韩国语教育与研究的开展	http://www.kf.or.kr/	《关于促进文化外交的特别法》(2011) 《在外同胞财团法》(1997)
	在外同胞财团	走出去 直接的 引进来 间接的	韩文学校 面向侨胞提供非学历韩国语教育 约请侨胞来韩在委托大学等机构接受语言和文化教育	http://www.okf.or.kr/	
	韩国国际协力团	走出去 间接的	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研究机构, 派遣韩国语教育志愿者	http://www.koica.go.kr/	
		间接的 引进来	邀请公务员访韩并委托国内大学进行韩国语培训		

主管部门	执行机构	方式特点	实施机构及举措	网站	法律法规
教育部	国立国际教育院	走出去 直接的	韩国学校	面向侨民提供正规学历教育	http://www.niied.go.kr/ 在韩国国民教育支援相关法律法规
		走出去 直接的	韩国教育院	面向侨民、侨胞、外国人提供非学历语言文化教育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引进来 直接的	教学科研机构，吸引外国高级研究人员来韩进行韩国语和韩国学研究（教授研修，硕博研究生培养）	http://www.aks.ac.kr/	

中国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研究前景¹

王宇波, 谭昭

内容摘要:近年来,西方关于新媒体意见领袖的专业化、科学化的研究越来越成熟,中国学者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路径。经分析发现: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话语传播体系、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识别及特征、传统意见领袖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对比、新媒体意见领袖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以及新媒体意见领袖引发的危机等六个方面,在主题、重点、手段、目标上各有异同。为在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研究上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为中国政策提供有效参考,应借鉴其他国家的优势方法,促进中国研究、推动现实性发展、兼顾草根精英、组建跨学科团队并发挥优势,提升技术质量。

关键词: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前景

作者简介:王宇波,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新媒体话语传播。邮箱: wangyubo@whu.edu.cn;谭昭,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邮箱: daodao4207@163.com

Title: The Research Prospect of Discourse Diffusion of Chinese New Media Opinion Leader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pecialized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new media opinion leaders (NM-OLs) made by western scholars

1 基金项目:中国国家语委重点科研项目“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机制研究”(ZDI135-11);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大规模标注语料库的自媒体语言计量研究”(12CYY030);武汉大学自主科研(人文社科)项目,得到中国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has been increasingly mature. Chinese scholars are developing new research paths continually at the same time. Basing on rel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lated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ing on 6 topics, including the discourse diffusion system of social media, the discourse diffusion mode of NM-OLs, the recognition of NM-OLs and their features, the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opinion leaders and NM-OLs, the performance of NM-OLs in political events, and the crises triggered by NM-OLs. There ar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overseas research in terms of topic, focus, method and aim. For purpose of making more valuable achievements in discourse diffusion of NM-OLs and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s for Chinese policy,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overseas superior methods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ese research and realistic development, take both grassroots and elites into consideration, build interdisciplinary team and take full advantage in order to upgrade technique quality.

Keywords: new media; opinion leaders; discourse diffusion; prospect

Authors: Dr. Wang Yu Bo, lecturer,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Wuhan University/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Matte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sociolinguistics, new media discourse diffusion. Email: <wangyubo@whu.edu.cn>; Tan Zhao, postgraduate 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Wuhan University/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Matte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sociolinguistic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Email: <daodao4207@163.com>

社交媒体起源于西方，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97年在Newsbytes News Network 期刊上的文章“Internet World-Social Network To Webcast LA Mayoral Debate”。²在网络社交媒体出现的最初阶段，相关文章只是偏向于事实性描述。2000年以后，西方针对网络社交媒体的学术性研究正式兴起，比如“A Social Network Study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among Elementary Students and Teachers with Home Internet Access” (2001)³、“The Internet,

² 报纸 Newsbytes. March 13, 1997.

³ Faith McCreary; Roger Ehrich; Melissa Lisanti: A Social Network Study of

Social Networks and Loneliness” (2002)⁴ 等文章, 将社交媒体和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联系, 提出了一些对社会有推动作用、正面影响的建议。近 10 年, 随着 Facebook (2004 年创立)、Twitter (2006 年创立) 的风行、Web2.0 时代的到来, 西方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兴的新媒体意见领袖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研究。而 2010 年之后, 西方关于新媒体意见领袖的专业化、科学化的研究越来越成熟。

中国的新浪微博于 2009 年正式上线, 较国外的 Facebook、Twitter 起步晚了 5 年左右, 可说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开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交媒体软件。由于技术手段等原因, 中国学者在对社交媒体和新媒体意见领袖的研究方面也相对滞后。早年间的研究论文多为初步探析, 比如: 王翠荣的〈微博客写作特点探析〉(2010)⁵、张曼的〈微博新词新语探析〉(2011)⁶ 等。而近 5 年来, 中国学者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路径, 而这必须建立在对中西研究有相当了解的基础上, 找出双方研究的异同点、优劣势, 对此领域现存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 才能找到中国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研究的前路。

本文主要综合来源于 SSCI 和中国重要学术期刊、中西方近 10 年来关于社交媒体、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 100 余篇研究成果, 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Q1. 近年来, 中西方都从哪些方面取得了什么研究成果?

Q2. 中西研究的异同有哪些?

Q3. 中国进行研究的优劣势分别是什么?

Q4. 今后, 中国该如何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研究上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

以下, 本文就从这四个方面一一进行探讨:

Online Communication among Elementary Students and Teachers with Home Internet Access. *Proceedings of the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Annual Meeting*. 2001, Vol. 45, P. 575-579.

4 Jean-Francois Coget; Yutaka Yamaguchi; Michael Suman: The Internet, Social Networks and Loneliness. *IT&Society*. 2002, Vol. 1, P. 180-201.

5 王翠荣: 〈微博客写作特点探析〉, 《写作》, 2010 年第 7 期, 第 44-46 页。

6 张曼: 〈微博新词新语探析〉, 《学理论》, 2011 年第 23 期, 第 163-164 页。

一、中西方研究现状及成果

（一）社交媒体话语传播体系

近 10 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社交媒体平台的流行，中西方学者对于社交媒体的话语传播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西方，Josiane Jöuet（2009）研究认为，网络技术使得平民化的空间不断拓展，并逐渐成为了常态，取代了大众文化，其中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话语为平民阶层的大胆探讨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⁷ 类似地，中国学者罗永雄（2015）的研究也表明，网络舆情建构的深层动因是舆论主体的态度指向和情绪表达，这种建构过程对现存传播权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⁸

近 5 年，西方学者构建了只存在“意见领袖”和“普通成员”两种角色的“核心 - 边缘”微博社区结构，很好地描述了微博平台中的小世界和自由规模特征。同时，在社交媒体话语传播体系方面的研究中，文本分析、网络调查、深度采访、组间对比实验、心理授权量表等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其研究的科学化和跨学科性特征非常明显。

在中国，相关研究则更着重于发生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具体事件，早期有夏学英、刘永谋（2006）研究的 BBS 话语权力结构特征，表明了传统科层制的话语权力中心在虚拟社区中被取消，话语权力呈现离散状态。⁹ 近两年，中国学者的着重点转移到微博平台，研究指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已成为揭露社会问题的重要渠道，而不断间接地监控此类问题对改善民生有着重要作用。

（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

在西方，对于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研究的实验性和科

7 Josiane Jöuet: The Internet as a New Civic Form: The Hybridisation of Popular and Civic Web Uses in France. *Javnost - The Public: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2009, Vol. 16 Issue 1, P.59-72.

8 罗永雄：〈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建构及其影响〉，《编辑之友》，2015 年第 5 期，第 11-15 页。

9 夏学英、刘永谋：〈层级与离散：BBS 话语权力结构特征〉，《兰州学刊》，2006 年第 10 期，第 173-175 页。

学性较强,例如,Ko, N. Y. 等人(2013)通过调查和训练新媒体意见领袖,搭建了一个网络 HIV 预防咨询平台,表明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能使人们趋向于选择安全套等保护方式,但不能有效地减少同性性伴侣的数量。¹⁰其他西方学者或建立算法框架并进行统计学的分析验证,或通过网上调查验证了一些意见领袖的行为和信息效用发生关联的假设,辨识出意见领袖介入信息效用从而影响信息分享的渠道。

中国学者近年也从理论角度对新媒体意见领袖传播模式进行了一些研究,但多借鉴自西方理论,自身的理论建构和发展比较薄弱。不少学者阐述了意见领袖作为二级传播的核心概念,指出了意见领袖的三种话语策略组合类型。另外,中国学者也致力于对中国和西方的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进行对比研究。例如闫岩等人(2015)从跨文化层面对比分析 Twitter 和微博意见领袖的组成特征和活动特点,结果显示双方的共性大于差异性,两个平台的意见领袖都扮演了积极地信息中介者的角色;而在议程设置方面,议程话题也体现出媒体议程和人机互动相结合的双重特征。¹¹

此外,大多数中国学者更擅于从具体的社会事件出发,以分析梳理的方式来研究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话语传播模式。比如借“汶川地震”、“温州动车事故”、“南京梧桐让路”、“李天一案”等事件,分析事件在网上掀起舆论风波的整个过程,或将事件发展分期,或分析新媒体意见领袖的构成,或研究意见领袖们的话语表达策略,在一定意义上对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的部分特征进行了揭示。但由于缺乏全面的科学假设与验证,因此对传播模式的整体把握明显不足。

(三) 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识别及特征

西方学者在新媒体意见领袖的技术识别上做得较好。有的学者根据一些针对某些专门活动的社交网站(如在线旅行者互动网站、教育类论坛)进行调查,研究得出这类平台上新媒体意见领袖的

10 Ko, N.Y. et.al.: Effects of Internet Popular Opinion Leaders (iPOL) Among Internet-Usi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3, Vol. 15: e40. <http://www.jmir.org/2013/2/e40/>

11 闫岩、詹妮弗·格雷尔:《中美微博时代的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新闻与传播评论》,2014年第1期,第22-30页。

特征，并以此构建了意见领袖识别框架。也有学者力图设计识别意见领袖的步骤和方案，比如 Deng, X. L. 等人（2013）利用在新浪微博上抓取的数据，形成了节点中心性的可视图，依据中介中心度、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等衡量标准识别意见领袖。¹²除此之外，西方学者对于识别算法和相关软件的探讨也很多，例如 AHP 和 Page Rank 算法、动态观念等级算法（Dynamic Opinion Rank Algorithm）都曾得到深入的研究并被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进；一些学者分析评述了统计分析新媒体意见领袖的数据及影响力的工具（比如 Klout——用以衡量上线影响、Peer Index——可通过追踪网络活动来计算用户影响力和创造社交资本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计算中，感情色彩被纳入考虑范围，并且被赋予了适当的权重。

相比较而言，中国虽然也有一些算法上的研究，但更多地还是倾向于从文本分析出发，总结新媒体意见领袖的特征。比如刘志明等（2011）从用户活跃度和影响力两个角度考虑，构建了微博意见领袖指标体系，使用了层次分析法和粗糙集决策分析理论，实验还表明意见领袖是主题依赖的，只有很少用户可以在不同主题同时成为意见领袖¹³，这与 Li, Y. Y.（2013）在国外研究的成果不谋而合。¹⁴还有一些中国学者或采用 SPSS 等软件录入文字、超链接、图片、颜文字等指标挖掘出名人型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使用特点，或指出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话语角色身份并阐述其伦理责任。可以说，在特征分析上中国研究做得较好，但涉及到整体的识别方法，就明显落后于西方。

12 Xiaolong Deng et.al.: Parallel Micro Blog Crawler Construction for Effective Opinion Leader Approxim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AASRI Conference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and Systems (DCS 2013 V5)*.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2013, P.170-176.

13 刘志明、刘鲁：〈微博网络舆情中的意见领袖识别及分析〉，《系统工程》，2011年第6期，第8-16页。

14 Li, Yanyan et.al.: An Improved Mix Framework for Opinion Leader Identification in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013, Vol. 43, P.43-51.

(四) 传统意见领袖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

新媒体是近 10 年来的新生事物, 因此中西方学者对传统意见领袖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的异同性皆有所关注。在西方, 不少学者对传统的“三级传播理论”与新媒体进行了结合, 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意见。比如, Hung, ES. 等人 (2011) 认为新媒体网络巩固了 Klaus Jensen 在 2009 年提出的“三级传播理论”。¹⁵ 但在 2013 年, Hung, ES. 等人又修改了他们的理论, 认为“三级传播理论”只是部分有效, 网络时代只是给一些曾经的传统意见领袖提供了更多展示他们个性化信息的机会, 而非在社会层面上促进了新的新媒体意见领袖阶层的兴起。¹⁶ 此外, 还有部分学者研究表明, 使用报纸和网络对传统意见领袖的自我效能有相对的促进作用, 而电视并无明显正面影响。也有学者指出, 在传统意义上掌握了权力的人同时也拥有更大的网络权力。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 中国学者对于传统意见领袖和新媒体意见领袖的对比研究大多建立在中国国情上。有学者认为虽然微博使草根的声音得到了放大, 但得到成倍放大的还是精英话语, 也有人认为微博对传统修辞权威进行了解构, 以单一的言语行为激起无数言后行为, 因此读者对于作者的话语权力实现了逆转。基于中国深厚的“士文化”, 庄永亮 (2014)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入手, 着重分析了从传统中国的士人阶层到近代中国的报人阶层, 再到当下中国传媒意见领袖之间的精神延续, 表明了家国意识和公共责任感是传统和新媒体意见领袖共同的内在精神支撑。¹⁷ 由此可以看出, 由于中国在传统上就缺乏关于意见领袖的理论, 因此比起西方对其传播理论的结合与发展, 中国研究相对缺乏相关的传播学与语言学的理

15 Hung, ES; Calderon, CA: Online Opinion Leaders in Colombia, Venezuela and Iran. Case Top20 Most View Users in Twitter. *Comunicación y Sociedad*. 2011, Vol. 24, P.75-100.

Jensen, Klaus Bruhn: Three-step Flow.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2009, 10(3), P.335-337.

16 Hung, ES: Online Opinion Lead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Case of the Top 20 Most-viewed Twitter Users. *Informacao & Sociedade-estudos*. 2013, Vol. 23 Issue 2, P. 139-155.

17 庄永亮: 〈士志于道: 中国传媒意见领袖的传统血脉与现实影响研究〉, 《传媒与教育》, 2014 年第 1 期, 第 24-28 页。

论基础和意识。

（五）新媒体意见领袖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

鉴于政体、国情差别，西方学者对政治活动中的新媒体意见领袖研究较多，中国则几乎没有。在西方，Park, C. S. (2013) 依据使用与满足理论，结合意见领袖使用 Twitter 的频率，通过普遍的回归分析法得出，使用频率高的新媒体意见领袖，其信息搜寻动机和公众表达度将成为政治谈话和政治活动的重要预测因素。¹⁸ 再比如，Gökçe, O. Z. 等人 (2014) 在一个关于土耳其政治意见的项目中收集了一些 Twitter 数据，绘制了 1000 多万用户的社交网络图，并确定了其中的意见领袖，探究了土耳其的政治言论是如何形成的，新媒体意见领袖们又是如何利用各式策略来扩散他们观点的。¹⁹ 此外，也有西方学者通过他们特有的大选事件研究意见领袖的职业、地区、用户中心性的关联，或者通过问卷调查表明，在 Web 2.0 时代，政治行动者们的受众集中于新媒体意见领袖的大军中。虽然由于政体和国情差异，中国的研究不可能涉及到大选这类内容，但西方的很多研究方法（比如数据可视化、学科交叉方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六）新媒体意见领袖引发的危机

由于新媒体意见领袖的兴起利弊并存，所以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这类现象已经或者可能引发的危机都有深刻的思考。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在此方面担心的是线上和线下的关系，即担心新媒体意见领袖的繁盛引发的是一种泡沫式虚华，对于现实意义寥寥；而中国学者们主要担忧的是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违法、不负责而造成的人心紊乱和社会动荡，同时他们也考虑到除意见领袖外其余的“大多数”所面临的困惑。

比如西方学者 Nisbet, M. C. 等人 (2009) 就指出，如果不

18 Chang Sup Park: Does Twitter Motivate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Tweeting, Opinion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Vol. 29, P. 1641-1648.

19 Osman Zeki Gökçe et.al.: Twitter and Politics: Identifying Turkish Opinion Leaders in New Social Media. *Turkish Studies*, 2014, Vol. 15, P. 671-688.

回归现实效应,那么新媒体意见领袖也是无力的。²⁰ Campus, D. (2012) 也认为线下的交流远远重于线上的交流,因此,网络世界中的意见领袖的有效度仍需考量。很多博客的博主都坦白,他们使用博客,更多地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达诉求,而非与他人沟通。²¹但是我们认为,部分类似结论与当时智能手机还未全面覆盖公众生活有关。一旦“互联网+”的时代来临,这样的问题一定会得到缓解。总之,相较于更多中国学者对“人心动荡”的忧虑,西方学者考虑更多的则是现实利益削减的危机,这与中西方国家权力的实现区别和经济社会的运作差异息息相关。

在中国,很多学者指出了新媒体意见领袖已经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假消息泛滥、滋生混乱、人文精神派学者的归隐状态、微博的自我封闭和集群性等。王平等(2012)从张鸣等人被迫退出新浪微博等事件来看,认为与传统媒体时代一样,新媒体意见领袖仍只能以签约化的方式,遵从权力的意愿,在媒体中讨生活。²²晋国群(2015)则指出了中国现存的网络话语权失范现象:其一,责任意识淡薄,容易形成畸形舆论;其二,表达中自主性的迷失容易导致舆论危机。²³对于未来的隐患,不少学者也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在新媒体环境下,个体很容易受到“沉默螺旋”机制的共同支配,被意见领袖裹挟;而新媒体意见领袖也极有可能为了迎合公众而发表意见,并未为大众提供真实的和有价值的信息。

二、中西方研究异同

(一) 研究主题异同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中西方学者在社交媒体话语传播体系、新

20 Nisbet, Matthew C; John E.Kotcher: A Two-Step Flow of Influence?: Opinion-Leader Campaigns o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9, Vol. 30, P. 328-354.

21 Campus, Donatella: Political discussion, opinion leadership and trus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 Vol. 27, P. 46-55.

22 王平、谢耘耕:〈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的实证研究: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82-88页。

23 晋国群:〈网络话语权与舆情引导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年第6期,第126-127页。

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模式、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识别及特征、传统意见领袖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新媒体意见领袖引发的危机这5个方面都有相当丰富的研究。但是,关于新媒体意见领袖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中国的研究几乎为零,而国外学者的案例分析、理论构建众多。这源于中西政体、国情的差别。虽然西方学者偏重于关于政治案例的研究,比如选举投票、党派之争,但中国学者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案例分析也层出不穷,比如食品安全、邓玉娇案。

(二) 研究重点异同

中西方研究主题的共同落脚点是新媒体话语权力和决定新媒体意见领袖影响力大小的因素。但是,西方研究偏重于将硬性指标作为证据,中国学者却更擅于从深层原因来解构话语影响力,分析得出一系列决定因素。比如 Oeldorf-Hirsch, A. 等人(2015)通过 $3 \times 2 \times 2$ 的组间对比实验,利用心理授权量表等一系列测定方法得出,Facebook 中一些社交心理吸引力比起个人功能的心理吸引力更重要,而涂鸦墙、点赞、@、评论四个要素对提升参与度至关重要。²⁴ 而中国学者丁汉青等(2010)通过跟踪不同话题发现了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的传播特点:其意见的扩散呈现“长尾”状,吸引注意力的高潮明显提前。²⁵

(三) 研究手段异同

在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识别及特征的方面,西方显然在技术层面上优于中国,这与他们学科间很好的融合密不可分。要识别新媒体意见领袖,不但要从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方法构建,更离不开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的帮助。西方学者使用 Klou、Peer Index、AHP 和 Page Rank 算法、节点中心性的可视图、动态观念等级算法等等技术手段,对意见领袖的识别和特征进行了相当周密的研究。受传统学术文化和文理分科的影响,中国学者更擅长的是剖析、阐释、梳理、总结,比如,刘锐(2011)探究了积聚

24 Anne Oeldorf-Hirsch; S. Shyam Sundar: Posting, Commenting, and Tagging: Effects of Sharing News Stories on Faceboo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Vol. 44, P. 240-249.

25 丁汉青、王亚萍:《SNS 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特征之分析:以豆瓣网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3期,第82-91、111页。

性、集权性、圈群化、跨界化、亲和力等微博意见领袖特征。²⁶当然,近年来中国学者也逐步有了跨学科研究的思维,将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等学科知识应用到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识别和特征研究中,比如樊兴华等(2013)指出了影响力扩散模型 IDM 存在的缺陷,创造了 IDPM 模型以筛选新媒体意见领袖,在相同兴趣空间上定义单个关键词语传播概率影响力,在用户影响力计算时给每个帖子一个影响因子,使模型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²⁷李富健(2015)依据区间直觉模糊理论对意见领袖话语影响力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创造了一套实用的意见领袖话语影响力度量方法。²⁸

此外,观察 SSCI 刊物成果和中国重要期刊成果的行文,不难发现,西方的研究多从研究问题或者假设出发,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直接性,但中国研究一般是条分缕析,说理阐释,自圆其说,问题意识尚有缺乏,研究的可信度不够,即使是运用到一些其他学科知识来设计算法的文章,也缺乏西方研究的严谨性和全面性。西方的相关成果通常都非常详细地展示了整个研究的过程,从假设、研究方法、数据来源、数据处理、结果分析、结论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全面细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中国的研究还较为落后,通常只将思路、算法或者公式展示出来,却在投入使用方面做得不够,多为纸上谈兵。

最后,从理论方面来说,中西学者都有引经据典的意识。不过,西方学者在研究时涉及到的理论来自各个学科,较为丰富,通常也是某学科领域中公认的理论,比如信息效用理论、ICT 效应、使用与满足理论等。他们在使用已有理论、创造新兴理论方面较为突出。中国学者对于各个学科理论的掌握还不足,使用也不够自如,使用的理论模型也多来源于西方,没有自己的创新,比如“沉默的螺旋”机制、语言策略理论,虽提及不少,但深刻不足。

26 刘锐:《微博意见领袖初探》,《新闻记者》,2011年第3期,第57-60页。

27 樊兴华等:《影响力扩散概率模型及其用于意见领袖发现研究》,《计算机学报》,2013年第2期,第360-367页。

28 李富健:《微博意见领袖话语影响力计算方法研究》,《现代经济信息》,2015年第8期,第69-70页。

（四）研究目标异同

在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研究中，中西方学者都试图厘清社交媒体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传播，也试图解决现实性问题，将虚拟世界在现实世界中的投射看清，这是所有学者研究的共性。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区别和学术传统差别，双方学者对于最直接的研究目标还是有所不同。

在传统意见领袖和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对比中，中国学者更多地从精神上剖析意见领袖的变迁，从构成人员到影响力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于权力背景和民众心理的变化考察，比如朱波等人（2011）就一再指出传统媒体平等对话的受众观塑造着社会认同。²⁹但西方学者更多地是从传播学技术进步的层面来分析新媒体意见领袖的状况，比如 Park, C. S.（2013）指出，Twitter 上的意见领袖与传统的意见领袖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不再那么重要，他们的作用不再符合传统上 Lazarsfeld 的“两级传播理论”模式，更多地是进行着“多重渠道传播”。³⁰

在新媒体意见领袖引发的危机研究上，西方学者显然重视的是领袖们在网络上的独领风骚对现实的进步到底有没有真正强烈的促进作用。比如 Nisbet, M. C. 等人（2009）就大为赞赏美国在此方面做得较好的 My.BarackObama.com 平台，它不仅为气候环保活动寻找到支持者，募集到资金，更为支持者个体间的沟通创造了渠道，有助于他们在当地社区组织活动。³¹类似的还有 We Campaign。中国学者探究的多为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是否会引发民众的混乱，并为政府机构、媒体部门、意见领袖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比如沈晴（2015）呼吁各界大力建设有序的网络公共空间和良性的社会发声机制。她表示意见领袖务必在明晰自由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

29 朱波、杨加方：〈论 web2.0 条件下虚拟社群之外的“意见领袖”话语作用〉，《中国地市报人》，2011 年第 C1 期，第 33-35 页。

30 Chang Sup Park: Does Twitter Motivate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Tweeting, Opinion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Vol. 29, P. 1641-1648.

31 Nisbet, Matthew C; John E.Kotcher: A Two-Step Flow of Influence?: Opinion-Leader Campaigns o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9, Vol. 30, P. 328-354.

言论自由、个体权利与社会伦理、法律边界的问题,对发声原则、角色意义等形成深入认知,才能不断提升话语价值。³²

三、中国研究的优劣势分析

(一) 优势

关于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研究,中西各有其特点。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有天然的优势。一项研究的结论可信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样本容量的大小,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只有数百万人,所以在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样本容量较小。而中国 14 亿人口给调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样本源,只要用恰当的条件进行合理的筛选,就能够让研究结果非常有说服力。同时,中国的历史资源丰富,无论是文献典籍还是历史现实的丰富度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给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历时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从学术传统优势来说,中国学者非常擅长进行描述、阐释、梳理、分析和总结,这对于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新媒体意见领袖的话语是依附于具体的舆论事件的,如果没有了话题,也就没有了意见领袖。而对于一个舆论事件的理解很大程度上需要详尽的观察和梳理、描述和阐释。另一方面,在进行整个话语传播模式的深层抽象和概括时,也离不开抽丝剥茧的分析一针见血的总结。

此外,中国学者非常擅于学习他人的长处,近两年就有不少学者引进国外实证主义的方法,不断运用计算机科学技术、社会学理论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可以看到的是,现今,西方在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方面的优秀研究,相当一部分也是华人的成果,其中不乏用到 AHP、Page Rank、动态观念等级算法(Dynamic Opinion Rank Algorithm)的,也有自主绘制节点中心性的可视图的,等等。这证明,只要愿意并且擅于学习他人的长处,与自己的优势相结合,就可以在研究的道路上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32 沈晴:《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自由与言说理性》,《新闻爱好者》,2015 年第 3 期,第 54-56 页。

（二）劣势

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和现实生活联结非常紧密，这样就意味着这方面的研究一定要和实验、调查、统计等实证性方法联系在一起，但是，中国研究在此方面又恰恰有着很多劣势。

其一，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可调查的对象数量很多，但是限于科研财力、历史传统等问题，愿意配合研究的人还是很少的。因为一项完整、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被调查者来说也一样。例如 Oeldorf-Hirsch, A. 等人（2015）的研究就首先需要通过一些测试选取符合条件的志愿者，然后还要对这些志愿者进行培训，在分享信息后，参与人员还要填写关于兴趣度的李克特式量表、关于参与度感觉的佩尔斯认知参与规模量表、关于影响力感觉的心理授权量表等，并且要在一周后继续合作以探究评论价值。³³ 这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程序都相当复杂，如果还想寻找到一定数量的新媒体意见领袖作为被调查对象，配合研究项目，是极其困难的。

其二，中国文理分科的学科传统也是一个劣势。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题目，要识别新媒体意见领袖，并研究其产生、话语、影响，涉及到多个学科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但中国存在一种尴尬的情况，即：语言学的学者通常只从字里行间来研究意见领袖话语策略、话语特点，传播学的学者通常只从社交网络关系来看信息散播的模式，计算机科学专家通常只从概念上提出一种识别算法，等等。但是，真正的跨学科团队并未普及，或者说没有发挥到切实的作用，无论是自然科学专家还是人文社科学者，都有跨界意识，却未在行动上进行优秀的合作而创造更大价值。

四、中国研究前景

（一）对比中西方新媒体意见领袖，促进中国研究

在中国，现今既有的大多数研究都建立在国家的新媒体平台基

33 Anne Oeldorf-Hirsch; S. Shyam Sundar: Posting, Commenting, and Tagging: Effects of Sharing News Stories on Faceboo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Vol. 44, P. 240-249.

础上,如微博、微信、博客等,但对于国外情况了解不够深入。学者们虽然知道西方的 Facebook 和 Twitter,但是无论是从对国外文献的研究上,还是从一手资料的掌握上来说,大多数学者并未对其有深入的探索。但事实上,学者们不应忘记,新媒体最早起源于西方,要研究和新媒体相关的意见领袖话语及其传播,必然离不开对其根源的考察。Facebook、Twitter 和中国的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特性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具体案例上,国外学者更多地探讨党派之争和选举进程中意见领袖的作用,但中国更多地是分析一些舆论危机事件,为政府监管部门提出一系列建议。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对于意见领袖话语关注的此类差别,归根结底是与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别有关。因此,对比中西方新媒体意见领袖的情形,也可以推动与中国其他学科的共同发展。认真研究后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在进行政治事件的剖析时,运用到很多重要的研究方法。比如 Manolache, M. 等人(2013)在研究欧盟 27 国之间是怎样通过一些网络团体在社交网站上进行交流时,就运用了一些人种学的方法,探究了这样的传播特性是向心性的还是离心性的,以及其中的意见领袖的影响模式。³⁴ 这样的方法一旦被中国学者借鉴过来,就能够研究很多中国本土各民族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问题。

(二) 以务实精神推动现实性发展,兼顾草根精英

通过前面的研究不难发现,西方研究非常关注虚拟世界在现实世界的映射、线上到线下的实际效果,同时也格外注重草根意见领袖的话语权。比如 Zhu, J. 等(2013)选取草根意见领袖“作业本”的微博进行案例研究,从文本、微博相互作用、节点关联构建三方面着手,研究了知名草根意见领袖微博的特性及其创造力,为草根用户扩大自己微博影响力提供了一些参考。³⁵ 外国学者 Nisbet, M. C. 早在 2009 年就介绍了 My.BarackObama.Com、We Campaign 等

34 Manolache, M.; Epuran, Gh: *Online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n Twitter: A Netnographic Approac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Media in Academia - Research and Teaching (SMART). 2013, P. 93-98.

35 Zhu Jing; Zhan Xu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Micro-blogs of Grassroots Opinion Leaders*.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3, 832-837.

从线上到线下的平台³⁶，Ko, N. Y. 等人（2013）也通过调查和训练新媒体意见领袖，尝试性地搭建了一个网络 HIV 预防咨询平台。³⁷在中国，也有相关的意见领袖在做这类公益性工作，比如新浪微博的“免费午餐”等，但是还是非常少，并且关注来源较为零散，没有形成规模性效应。近年，中国学者也在不断发声，指出本土新媒体意见领袖研究的过度精英化，对草根领袖关注的缺失，比如洪婧茹（2014）通过对“学习粉丝团”新浪微博话语传播策略的实证研究，就折射出微博平台中草根意见领袖的普遍尴尬：民众对意见领袖现实中身份的认知与期待影响了其在微博场域中的话语权威性。³⁸这样的重精英、缺乏务实精神的研究特性与中西文化差异不无关联。在这个价值多元、提倡个性的时代，对于草根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的关注和相关建议也亟待研究。现实世界的发展无法脱离群众，由虚拟世界回归到现实大众世界是所有研究的终点，因此，中国未来研究的趋势应当是更加务实、更加平民。

（三）组建跨学科团队并发挥优势，提升技术质量

从前文大量的中西研究对比材料可发现，西方学者在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研究时，用到了很多学科手段以进行支持，或是论文本身就系统性地用到了某些方法，或是在研究前景中提及到相应方法。比如：Choi, M. 等（2014）在研究中提到了可用于检验分组并实现其可视化的 Gephi 软件，以及用来计算和比较不同群簇之间网络密度的 UCINET6。³⁹Xu, W. W. 等（2014）表示，在大型网络中寻找“丛”需要标准化网络分析软件进行矩阵操作，这些软件包

36 Nisbet, Matthew C; John E.Kotcher: A Two-Step Flow of Influence?: Opinion-Leader Campaigns o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9, Vol. 30, P. 328-354.

37 Ko, N.Y. et.al.: Effects of Internet Popular Opinion Leaders (iPOL) Among Internet-Usi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3, Vol. 15: e40. <http://www.jmir.org/2013/2/e40/>

38 洪婧茹：〈社会资本与草根意见领袖传播策略：对“学习粉丝团”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新媒体与社会》，2014年第1期，第157-175页。

39 Myunggoon Choi; Yoonmo Sang; Han Woo Park: Exploring Political Discussions by Korean Twitter Users: a Look at Opinion Leadership and Homophily Phenomenon.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4, Vol. 66, P. 582-602.

括 UCINET、Pajak 和 NODEXL 等。⁴⁰ 相比之下, 中国的跨学科团队优势还未发挥得很好。西方关于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分析的文章多为多学科合作成果, 但中国更多地是从自身学科角度出发, 难以站在更高的角度纵观全局, 也就无法得出完备的、令人信服的结论。Xu, W. W. 等 (2014) 也表示, 调查和分析必须很好地进行结合, 以建立一种经验主义的联结。⁴¹ 在此方面, 中国学者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 即擅于经验总结、阐释分析。但是, 如果能够组建并发挥跨学科团队的真正优势, 具体来说就是让算法能投入有效使用, 让分析能纳入具体算法, 从而可以系统化、高效率地解决本土现实问题, 就堪称最有质量的成果。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综述和评析发现, 中国的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研究更倾向于从具体社会事件着手, 从文本分析出发, 对于传播学和语言学的理论构建和发展比较缺乏。同时, 在研究的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不佳, 科学化、量化的研究方法应用不足, 从而导致了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方法单一化、研究结果空洞化的问题。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中国学者享有丰富的研究材料数据, 拥有深厚的分析阐释功底, 具有敏锐的问题发现眼光。并且, 近几年在新媒体意见领袖话语传播方面, 部分西方刊物的优秀研究成果来自华人, 其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到中国社会事件的新媒体传播, 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循序渐进地在理论、方法等方面借鉴西方优势成果以推动相关研究。在未来, 在中西对比中寻找创新研究方法、以新媒体意见领袖研究推动现实性发展、组建跨学科团队并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是重中之重。只有通过以上途径, 才能充分利用好中国海量的新媒体数据资源, 促进传播学和语言学学术理论的进步, 同时将理论投入应用, 切实地解决当下由新媒体意见领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并充分发挥新媒体意见领袖的作用以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

40 Weiai Wayne Xu et.al.: Predicting Opinion Leaders in Twitter Activism Networks: The Case of the Wisconsin Recall Elec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4, Vol. 58, P. 1278-1293.

41 同上。

参考文献

1. 白淑英、党杰：〈网络集体行动中意见领袖的话语策略——以李天一案件为例〉，《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 常秋玲：〈意见领袖在微博口碑再传播中的影响力研究〉，《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 陈雪奇：〈社会化媒体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传播策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 崔蓬克：〈论网络媒体对于修辞权威和权力关系的影响：以博客和微博为例〉，《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5. 丁汉青、王亚萍：〈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特征之分析：以豆瓣网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3期。
6. 樊兴华等：〈影响力扩散概率模型及其用于意见领袖发现研究〉，《计算机学报》，2013年第2期。
7. 洪婧茹：〈社会资本与草根意见领袖传播策略：对“学习粉丝团”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新媒体与社会》，2014年第1期。
8. 胡勇等：〈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意见领袖形成模型研究〉，《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2期。
9. 姜珊珊、李欲晓、徐敬宏：〈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意见领袖分析〉，《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12期。
10. 晋国群：〈网络话语权与舆情引导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年第6期。
11. 雷海平：〈微博话语场中的意见领袖〉，《现代交际》，2011年第8期。
12. 李富健：〈微博意见领袖话语影响力计算方法研究〉，《现代经济信息》，2015年第8期。
13. 李名亮：〈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学术界》，2012年第6期。
14. 李名亮：〈现实与隐忧 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力〉，《今传媒》，2012年第5期。
15. 李怡霖：〈从意见领袖到人人呼吁：新媒体时代下的邻避运动：基于昆明PX项目群体动员的个案研究〉，《新媒体与社会》，2013年第3期。
16. 刘锐：〈草根意见领袖在网络突发公共事件舆论中的作用机制：以屠夫为例〉，《新媒体与社会》，2012年第3期。
17. 刘锐：〈传统媒体出身的网络意见领袖在突发公共事件舆论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以盛大林为例〉，《新媒体与社会》，2012年第2期。

18. 刘锐: 〈微博意见领袖初探〉, 《新闻记者》, 2011 年第 3 期。
19. 柳旭东: 〈意见领袖在社群媒体传播中的维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 年第 6 期。
20. 刘志明、刘鲁: 〈微博网络舆情中的意见领袖识别及分析〉, 《系统工程》, 2011 年第 6 期。
21. 芦何秋、杨泽亚: 〈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策略与文本框架: 基于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5 期。
22. 罗永雄: 〈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建构及其影响〉, 《编辑之友》, 2015 年第 5 期。
23. 欧阳莹莹、刘利芳: 〈名人型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使用分析——以新浪微博为例〉, 《今传媒(学术版)》, 2013 年第 5 期。
24. 桑亮、许正林: 〈微博意见领袖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 《当代传播》, 2011 年第 3 期。
25. 沈晴: 〈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自由与言说理性〉, 《新闻爱好者》, 2015 年第 3 期。
26. 王大鹏、王婧: 〈基于语料库的微博意见领袖话语影响力分析〉, 《新闻知识》, 2014 年第 1 期。
27. 王君泽等: 〈微博客意见领袖识别模型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 年第 6 期。
28. 王平、谢耘耕: 〈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的实证研究: 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3 期。
29. 王延隆: 〈名微博舆情调查及其对青年的影响〉, 《当代青年研究》, 2013 年第 2 期。
30. 夏学英、刘永谋: 〈层级与离散: BBS 话语权力结构特征〉, 《兰州学刊》, 2006 年第 10 期。
31. 闫岩、詹妮弗·格雷尔: 〈中美微博时代的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4 年第 1 期。
32. 杨岚: 〈谁拥有微博话语权? ——试论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语文学刊(基础教育版)》, 2014 年第 4 期。
33. 朱波、杨加方: 〈论 web2.0 条件下大众传媒“意见领袖”的话语作用〉, 《毕节学院学报》, 2011 年第 6 期。
34. 朱波、杨加方: 〈论 web2.0 条件下虚拟社群之外的“意见领袖”话语作用〉, 《中国地市报人》, 2011 年第 C1 期。
35. 朱敏: 〈网络意见领袖话语分析〉,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0 期。

36. 庄永亮: 〈士志于道: 中国传媒意见领袖的传统血脉与现实影响研究〉, 《传媒与教育》, 2014 年第 1 期。
37. Anne Oeldorf-Hirscha; S.Shyam Sundarbc: Posting, Commenting, and Tagging: Effects of Sharing News Stories on Faceboo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Vol.44).
38. Bobkowski; Piotr S.1: Sharing the News: Effects of Informational Utility and Opinion Leadership on Online News Sharin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5(No.2).
39. Chang Sup Park: Does Twitter Motivate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Tweeting, Opinion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No.4).
40. Dalrymple, Kajs E.; Shaw, Bret R.; Brossard, Dominique: Following the Leader: Using Opinion Leaders in Environmental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13 (No.12).
41. Donatella Campus: Political Discussion, Opinion Leadership and Trus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No.1).
42. Dubois, Elizabeth1; Gaffney, Devin: The Multiple Facets of Influence: Identifying Political Influentials and Opinion Leaders on Twitter.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4(No.10).
43. Feng Li; Timon C, Du: *Listen to Me - Evaluating the Influence of Micro-blog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14(Vol.62).
44. Huang, Baocheng; Yu, Guang; Karimi, Hamid Reza: The Finding and Dynamic Detection of Opinion Leaders in Social Network.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14(Vol.2014).
45. Hung, ES; Calderon, CA: Online Opinion Leaders in Colombia, Venezuela and Iran. Case Top20 Most View Users in Twitter. *Comunicación y Sociedad*, 2011(No.1).
46. Josiane Jöuet: The Internet as a New Civic Form: The Hybridisation of Popular and Civic Web Uses in France. *Javnost - The Public: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2009(No.1).
47. Li, Yanyan et.al.: An Improved Mix Framework for Opinion Leader Identification in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013(Vol.43).
48. Myunggoon Choi; Yoonmo Sang; Han Woo Park: Exploring Political Discussions by Korean Twitter Users: a Look at Opinion Leadership and Homophily Phenomenon.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4(No.6).

49. Nai-Ying Ko et.al.: Effects of Internet Popular Opinion Leaders (iPOL) Among Internet-Usi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3(No.2).
50. Nisbet, Matthew C; John E.Kotcher: A Two-Step Flow of Influence?: Opinion-Leader Campaigns o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9(No.3).
51. Osman Zeki Gökçe et.al.: Twitter and Politics: Identifying Turkish Opinion Leaders in New Social Media. *Turkish Studies*, 2014(No.4).
52. Rune Karlsen: Followers Are Opinion Leaders: the Role of People in the Flow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n and Beyo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No.3).
53. Said-Hung et.al.: Online Opinion Lead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case of the Top 20 most-viewed twitter users. *Informacao & Sociedade: Estudos*, 2013(No.2).
54. Weiai Wayne Xu et.al.: Predicting Opinion Leaders in Twitter Activism Networks: The Case of the Wisconsin Recall Elec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4(No.10).
55. Xiaolong Deng; Yuxiao Li; Shu Lin: Parallel Micro Blog Crawler Construction for Effective Opinion Leader Approximation. *AASRI Procedia*, 2013(Vol.5).
56. Yala Penga et.al.: The Effects of Food Safety Issues Released by We Media on Consumers' Awareness and Purchasing Behavior: a Case Study in China. *Food Policy*, 2015(No. C).
57. Yan Lin et.al.: Hot Topic Propagation Model and Opinion Leader Identifying Model in Microblog Network.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2013(Vol.2013).

生态文明与哈尼族竜林文化刍议

赵德文

内容摘要: 当前,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关键话语, 并影响着我们的饮食、居住、呼吸等等行为活动, 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一沉重话题进行审视和反思。本文就生态文明与哈尼族的竜林文化进行思辨, 揭示哈尼族竜林文化具备人类典型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 呼吁建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和谐相处的人类生态文明观。

关键词: 生态文明; 哈尼族; 竜林文化

作者简介: 赵德文, 云南省社科院墨江县哈尼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 云南哈尼文化调查研究。邮箱: mjhn001@163.com

Title: A Discussion On Ecology Civilization And The Hani Ethnic "Long Lin" Cultur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d become a key discourse of our times, which has impact on our daily activities such as diet, living condition, and even the way we breath. For these reasons, this important subject requires careful examination. This essay is an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henomenon within the Hani's "Long Lin" culture. It will show that the Hani people possess a fundamen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at accor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cultivation of reverence for nature, and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kind and the natural world.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ni ethnic group; Long Lin culture

Author: Zhao Dewen,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Hani Culture of District Mojiang,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ajor area of research: Yunnan Hani Culture studies. Email: <mjhn001@163.com>

前言

尽管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制约，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中，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的行为方式应该符合自然规律，在生产布局、城镇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中都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一、生态文明面临的危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哈尼族作为山地农耕民族，千百年来世代依山势凭借短柄锄头和砍刀奋力开垦梯田，其生产劳动属“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探索、初步开发的阶段，历时几千年，对自然造成了一些伤害，但多数情况下，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没有受到毁灭性伤害，大自然可以自行修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丰富的物质产品，但是，人类在创造和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饱尝了高增长带来的苦果：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恶劣、气候变化、灾害频发等等。针对这些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自毁恶果，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类行为的准则。

尽管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制约，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近几年，包括云南在内的连年干旱导致水资源锐减，许多江河断流，湖泊枯竭，人畜饮水困难已经屡见不鲜；全国多年来平均缺水量 536 亿立方米，有 2/3 的城市缺水，110 座城市严重缺

水,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一些重点流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城市灰霾天气增多,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全国水田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37%、沙化土地面积占18%,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地面沉陷面积扩大,生态系统破坏带来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根本遏制。究其种种原因,都是人为因素所致,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生态脆弱,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生态文明的理念没有牢固树立,生态不文明的做法还普遍存在。

对国土空间的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分散开发,带来和造成了森林破坏、湿地萎缩、河湖干涸、水土流失、地面沉降、沙漠化、石漠化和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各种灾害频发等自然生态系统严重受损的问题,只有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

人类的需求既包括物质需求,如对农产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等生态产品的需求。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推进生态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在经济发展中,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肆意开发,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削弱了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认识到,人类与自然平等的,人类不是自然的奴隶,人类也不是自然的上帝。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中,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行为方式应该符合自然规律,在生产布局、城镇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中都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二、哈尼族竜林的文化要义

哈尼族以农耕为主,因此,宗教信仰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崇拜,村寨后面葱郁的山林就是哈尼族图腾祭祀、保寨平安、祈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神圣之地——竜林。多年来,笔者参与过墨江境内许多哈尼族村寨的祭竜活动,也寻访过哈尼族摩批。通过调查和研究,对哈尼族的竜林有朴素的基本文化认识。

（一）哈尼族竜林

哈尼族流传千百年传统的要建寨、先立神的说法，即树立“甫玛阿波”（竜神）。为了民族的安危、村寨的平安和诸事顺利，建寨时先要立的神就是竜神（即寨神），而寨神往往立在新建寨背后一片葱郁的森林中，选择一棵粗壮且枝叶茂盛的树作为竜树（即寨神树）。

墨江县碧溪乡那雷¹哈尼族豪尼人祭竜已有 450 年左右历史。据健在的寨子摩批²讲：“凡哈尼族居住的地方，户数达到几十户的寨子都要树立竜神，一片山林为竜林（呼玛），设一棵竜树（呼玛阿自）。”竜树是一种吉祥的现象，竜和水是分不开的，人们的生活、生产也时刻离不开水，因此竜就是通过对竜神的祭拜，来保护竜林（其实是水源林），让水源不枯，有潺潺长流水能灌溉梯田。由此，那雷哈尼人的祭竜是很隆重的，对竜神的敬仰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自建立起竜神，那雷哈尼人把寨子周围的山林都保护起来，规定谁也不许在竜林乱砍乱伐。泉水潺潺不绝，就连缤纷小草也流出甘美泉水来，层层梯田汪洋荡漾，构成和谐共存的自然生态圈。

哈尼族地方竜神的建立，竜林的保护，都大同小异，那雷的竜神建立较为传统和典型。那雷哈尼人有 450 多年的祭竜历史，在周围村寨里，以那雷竜神为长，分接出去的小竜有南科、小竹溪、章差、者替等。避寨子举行祭竜活动，往往都在那雷寨子之后，以表尊长之礼。

（二）哈尼族竜林祭祀

哈尼族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传统观念认为天地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天神（木玛阿匹）、地神（米擦阿玛）和竜神（甫玛阿布）等神灵。在哈尼族社会里，认为竜神（甫玛阿布）是保人畜平安、粮食丰收的最大保护神，所以在名目繁多的祭祀活动中，以祭竜最为庄严而隆重。

1 那雷：村寨名，地处中国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联珠镇碧溪村碧溪古镇旁，距离墨江县城 9 公里，为哈尼族豪尼人聚集的村寨。

2 摩批：哈尼语，哈尼族民间通晓传统文化和主持祭祀礼仪的人。

哈尼族的祭竜活动都在各自村寨的竜林里进行，一般为期三至五日，具体时间各不相同，有的在农历二、三月间，有的在农历十月间，但不论定在哪个月，祭竜日子都必须在属龙或属牛、马、猪、狗日进行。

由于哈尼族的祭竜是庄严隆重的祭祀活动，由此产生了与此相关的许多事项。

竜神树：一般是选择生命力旺盛，生长茂盛的株栗树、万年青树、灯塔树或柏枝树等。往往哈尼人在安村立寨的同时，在寨子上方（背后山）选好“神树林”，并且在林选定一棵最粗壮的长青树做“神树”，“神树”前用石板搭祭台，周围砌土坯墙卫护。哈尼人最崇敬“神树”，认为“神树”是哈尼人的保护神。“神树林”是保护神居住的地方，自然就是最神圣、最圣洁的地方。平时严防牲畜进入“神树林”，严禁伤害林中的树木。“神树”或“神树林”，哈尼话叫“夫玛”，祭祀“神树”叫“夫玛突”。“夫”义“村寨”，“玛”义女性、雌性、母亲、大，“夫玛”义为“村寨的母亲”。“夫玛突”义为“祭祀村寨的女神、寨神”。一般，哈尼族忌讳村人任意进入竜林，更是严禁砍伐竜林，即便是自然掉下的枯枝败叶，也不能随意拣回家里去烧。至今，仍有很多哈尼村寨的竜林一片葱郁，林中枯枝败叶任其化作腐质土，滋养竜林中的草木生长。

竜头：哈尼族的祭竜活动由竜头主持（不一定是寨中摩批）。哈尼族白宏人称竜头为“执莫朱巴”，哈尼族豪尼人称竜头为“夫疋”，一般任期一届为三年。

竜头是根据寨子里姓氏最多的人家，按照寨子户数多少，挑选出三家或五家至七家（单户而已）的鸡卦来看卦确定竜头候选人。能否当任竜头，需具备的条件是：第一，夫妻正常配偶，不讨小纳妾，并且双双健在。不吹赌嫖娼，不吃不过刀的肉，不吃没有胡子的肉，不钻风倒下。不满五十岁不得当选。全家各代表正常发育生长，有儿有女，不残废，勤劳致富，不做过罗别（贼），历代没有非正常死亡，最好为四代同堂；第二，在寨子群众中要有一定威望，能说会道，主持公道正义，有大公无私精神；第三，要会传唱哈尼族的民间传统古歌（哈叭卡、收致卡），如创世歌、祭祀歌、叫魂歌、讨福歌等。

推选竜头时看的代表各姓氏的鸡卦，是平常杀鸡时留下来而未

占卜过的，统一由值班坐批（摩批）集中主持，放入大缸中掺水搅乱混淆在一起。过一个时辰后，把水倒干净，再撒上若干米粒，由坐批背诵口诀，背毕，即行占卦。占卦中，谁家鸡卦出了怪箴就落选，谁家鸡卦得了“四平头”³就由谁家男户主担任本届竜头。

竜筩：是哈尼族祭竜时所使用的神圣物品。在开天辟地的史前时代，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水位退落后，哈尼族忠实的动物伙伴“阿克”——狗，为人们衔来了谷种。谷种受潮了，怎么办呢？是神灵授意用竜筩——炕筩把谷种烘干。在哈尼族安家盖好房屋后的一件大事是立火塘，同时火塘上挂炕筩，火塘和竜筩安好后不能移动。除火塘、竜筩，哈尼族的竜筩还有门罩。门罩是用几厘米宽、一厘米厚、长两米左右的竹片编成，一般高两米、宽一米半左右，安插在家门前五米开外的地方。门罩多用于家住寨边、门开朝西方路口的人家，其功能是避鬼。而哈尼族举行全寨性祭竜（甫玛突）时，往往多要用尖刀草编织成粗大的草绳，在寨子进口处两边栽上竹杆，把尖刀草拴在竹杆上，两边再挂上用小竹片编成光芒四射的太阳形状，它是鬼怪害怕的避邪物。哈尼族寨边拴了尖刀草绳和挂出竜筩，即告诉外人寨子里正举行祭竜活动，外寨人不得擅自闯入，否则视为侵犯。

在祭竜这一天，竜筩除在寨门口统一设置外，在进竜林的路口和竜树下都要拴尖刀草编织的绳索和挂上用竹片编成的器物设置竜筩。作用是把不干净的东西阻挡在寨外、竜林外等，起到驱邪避鬼的目的。

竜筩门：哈尼族居住的村寨一般都有竜筩门。千百年来，哈尼族祖先说下，大地是鬼神共同的家园，而不同之处是神灵住在竜林和天上，鬼怪住在荒郊野坝箐沟里，人是住在寨子里，人和鬼的分局界限就是竜筩门。有了竜筩门，鬼神就不会也不敢闯进寨子里，寨子里的人畜才能平安地过日子。所以，哈尼族很重视竜筩门这个人与鬼分界线的建筑。特别是在哈尼族举行祭竜祭祀时，鬼怪容易作祟，阻挠人与神灵之间的和睦关系。为了防止鬼怪的挑拨离间，给寨子人畜带来灾难，于是哈尼人在每年农历二、三月间举行祭竜时，都用尖刀草编粗大的绳索，拴在寨门口，并插上竜筩，在进竜

3 四平头：用鸡卦看相的一种卦象名称，一般一对鸡卦分左边为人边，右边为神边，每对鸡卦有上下左右对称的四签卦象即为四平头。

林的路上同样要设竜笆门，以此来阻止鬼怪作祟，驱邪避鬼，保佑全寨人安康。因此，各地哈尼族都要在祭竜之时插（挂）竜笆，以及置竜笆门，形成了哈尼族祭祀活动中附着丰富哈尼文化意义的事项。

祭竜活动：哈尼族的祭竜活动，一般为期三天。在祭竜前三天，竜头召集本届当东的各户主开会，商讨祭竜事宜，做好物资准备。祭竜当日（一般选择农历二月、三月或十月属龙、牛、狗、猪等），一大早家家都准备祭祀竜神用的糯米粑粑、黄饭花染过的糯米饭、鸡蛋、石榴花、香、纸钱等祀品，当东的各家男主人在摩批的带领下，早晨就到竜林里，在竜林四周砍来“香芝麻稞”和竹叶扎成扫帚打扫卫生，平整地基道路，在道路口用草绳高高拴起来。在草绳正中，插上用竹篾编成八角形，滴上鸡血、沾上鸡毛的“小竜笆”，拴了草绳、插了竜笆的道路口意为“竜笆门”。寨子里各家各户，也在祭竜日上午用竹篾做个小“竜笆”，插在自家大门上，以求驱邪避灾。

照片 1



给竜树栓挂竜笆

进入竜林，要开“竜笆门”，入林的人群跟随着身穿白长衫子，裹着白布包头，身挂长刀的竜头，一手提着白公鸡，一手提着四方小篾凳，走到竜笆门，念咒语：“这里是圣洁之地，不干净的不要进门，好吃懒做的不要进门，违法乱纪的不要进门”。于是，人们结队在“竜笆门”旁边用桶和盆放置的花椒水漱口、洗一把手，祈求吉祥如意。之后，人群便跟随竜头鱼贯入林。竜头走到竜树脚下，将四方小篾凳敬重地放在竜树脚下，请竜神就坐。随

即，抽出长刀，人们七手八脚地按分工动起手来，烧火的、担水的、杀鸡的，协助竜头杀猪的等等，各行其职。

照片 2



祭竜活动中进献水井

照片 3



向竜神树祭献

人们把猪、鸡等祭祀牲口弄干净后，加一个血碗，在竜神树（寨神）前铺干净枝叶，把猪摆成卧爬状，并在猪头前摆放一碗净水、三酒、一碗菜、插有株栗树花的一碗糯米饭和一碗白米饭，竜头向竜神树行礼，进行生祭，祈求吉祥。

此同时，各家各户把杀好的鸡，用筛子抬到竜树下，交给竜头，统一进行生食祭祀。祭祀时，点燃香火，烧纸钱，竜头口中念念有词，参加祭祀人，全体在竜树下叩拜磕头，竜头把身边准备好的白株栗树花一一插一束在各家献祭的糯米饭里。生食祭毕，各家抬来的鸡抬回家祭祖宗，以示竜神赐给各家祖宗食用，祖宗才得享用快乐。

照片 4



摩批为祭品插上野花

照片 5



竜树前的祭品

全寨人集体凑钱买的猪、鸡、蔬菜等，经宰杀，洗净切好后，由本届当东的人在竜树前的草坪里垒灶支锅，按本民族喜食的口味，烹出八碗以上的美味佳肴，摆在松毛、绿叶铺就的“桌席”上。下午四、五点钟，竜头敲响铓锣、牛皮鼓，当东的燃放鞭炮、火枪，请竜神吃饭。铓鼓声、鞭炮声、火枪声也是召集全寨各户男主人到竜林吃祭竜饭的信号。

开始吃祭竜饭前，寨子人在竜树前的松毛绿叶“桌席”前八人一桌团团围坐下来，每桌最先端上一盆肥中夹瘦的切片猪肉，把这些猪肉平均分配到各人携带的大碗里带回家，叫做包福禄。这是竜神赐福给各家各户的福气，带回家后，光敬献祖先，然后重新做熟后，全家人个个都要吃到一点，这样，在这一年里全家人人有福有禄、平安大吉、诸事顺利。

当东的人把各种菜肴摆上桌席，大家倒上自烤的包谷酒，盛宴就开始了。竜头所在的那桌饭菜摆在竜神树下，意为竜神座位。还需邀请一些年长者与竜头同席作伴，但上座的人都必须一夫一妻者，还要在群众中有些威信，能传唱一些哈尼族的传统古歌。

在竜林里，大家喝酒、吃肉，竜头、摩批和本寨德高望众的长兴们围坐在一起，传唱哈尼古歌，谈寨中的生产、生活，神采飞扬，红光满而，所有参加祭竜吃饭的人，个个神情愉悦，说着唱着，整个竜林沉浸在一派喜气洋洋之中。

哈尼族的“昂玛突”（即“普玛突”义“祭寨神”），从原始意义上讲，属于村寨祭祀活动。但随着哈尼族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其宗教意义逐渐淡化，被赋予了许多新内容，逐渐演化成具有很强的文化整合功能的节日庆典活动。的确如此，现今在墨江哈尼族村寨举行祭竜活动，不再是神秘封闭的宗教祭祀活动，甚至还邀请外寨人员结伴参加，妇女可以到竜林参加祭祀，并在竜林进行民族传统歌舞表演，如联珠镇的癸能大寨和勐簸寨子的祭竜，都已向外人开放，也解除了对妇女的禁忌，可以说是移风易俗的新风尚体现。

如果在“昂玛突”节到哈尼山寨，很远处就能够听到古朴雄浑，催人奋进的锣鼓声。那具有生命力的强烈的节奏，穿透云雾，震撼山谷，荡人心魄。令人情不自禁加快脚步，想去看个究竟。进入哈尼山寨会看到身着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神采飞扬地引吭高歌和翩翩起舞。还可以看到许多神情庄重的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聆听哈尼歌手吟唱哈尼族的传世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风俗礼

仪、生产和生活经验……内容丰富多彩，无所不包。演唱如运诸掌，抑扬顿挫。听者如痴如醉，心旷神怡。整个哈尼山寨是歌的海洋，舞的世界，一派节日气氛。哈尼族世代崇拜竜神，祭祀竜神以祈求竜神的保佑和庇护。祭竜这一传统宗教祭祀活动，时至今日，它在保护森林、保护水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田园和家园以及传承哈尼族文化等方面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至今，我们用科学和辩证发展的观点对其进行审视，并加以继承和弘扬，不断丰富其科学内涵，必将为促进发展哈尼文化起到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哈尼族竜林文化彰显的生态文明

（一）哈尼族竜林生态保护的现实意义

哈尼族主要分布在哀牢山、无量山和三江流域的半山区。这一广袤的地域，海拔高差为 800-2000 米，气候温和而湿润，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宜于多种植物生长。由于哈尼族居于半山区，尤其村寨严格选择在山峦环合、古木怀抱的山凹坡地上，所以村寨里终年有丁冬的清泉供给人畜用水。摩天连云的梯田里，四季灌溉着喧哗的溪水，正是哀牢、无量两大山系“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优越自然环境条件。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它不仅能提供木材以及药材、水果、食品、纤维、化工原料、兽皮毛等各种非木材产品，还为人类提供生命活动所必需的氧气，同时具有净化环境、调节水分等的功能；森林在农业生态系统中还具有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减轻旱涝灾害和改善农田小气候的作用。

哈尼山乡素有绿色宝库之称，雄伟矗立的哀牢山和无量山两大山系，遍布着国家森林木材的生产基地和自然保护区。这里原始森林和次生林遮天蔽日，随处可见，其中优势树种有云南松、思茅松、油杉、栎木等数十种。深邃幽静的大森林里，成群的老虎、云豹、岩羊、鹿子等数十种异兽在出没；林间枝头上，孔雀、锦鸡、白鹇等上百种珍禽在飞翔；奔腾的红河、把边江、澜沧江中潺潺的溪流和宁静的龙潭里，豚、鲤、鲫、龟、虾等大量繁殖。这些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生活在高山纵谷间的哈尼族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源。

哈尼族遵循“要种田在山下，要生娃在山腰”的祖训，在亚热

带海拔 800-2000 米的气候温和的半山地带，选择向阳、开阔的山梁上建立新寨。一般标准是：村寨四周必须有山包、寨头的山包上必须有茂密的森林，以此作为寨神林（即竜林），供祭祀村寨守护神用。哈尼族大多划定寨子背后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作为竜神栖居之所，这片林子即是竜林，竜林内的一切动植物、土地、水源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严禁砍伐、采集、狩猎、开垦，即使风吹下来的枯树枝、干树叶，也不能动。为祈求竜神保寨平安、人畜安康、五谷丰登，哈尼族年年要到竜林里对竜神定期举行祭祀。

竜林是哈尼族传统的自然保护区，在两山三江的哈尼族村寨里，每个寨子都有各自保护的竜林。面积从十亩、数十亩到百千亩不等，林木苍翠挺拔，山林郁郁葱葱，竜神树掩映摇曳。可以说，竜林是用之不竭的天然绿水库，是哈尼族耕作梯田灌溉的直接水源来源。

在哈尼族山乡，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古老村落前沿那些鳞次栉比的梯田，顺着山势的蜿蜒，层层叠叠。从远远山脚箐低直挂到山颠云天，加之远近山色，田边村旁棕榈树、凤尾竹的衬托，犹如一幅幅构思奇巧而壮丽的图画，构成哈尼山乡特有的风光；整座山的梯田，从山却最低处一直向最高处搏击、波卷、涌荡了上来，那数不清的层层叠叠、重重迭迭、满山荡漾、流光溢彩，每一层都是一道细碎精致的涟漪，每一迭都是一片清静如鳞的波纹。此刻，天光飘荡在层层水波之上，金色的碎片缀满山林——一种令人震撼的东西，拽住了人的心房。

哈尼族梯田农业，就是充分利用亚热带山区垂直立体分布和与之相适应的植被立体性分布特点，构建而成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哈尼族对高山森林的保护是十分重视的，因为这是梯田农业的命根。哈尼族人畜饮水和梯田用水都来自于高山森林。哈尼族将森林分为水源林、村寨林和竜林。哀牢山哈尼族一年数次的大规模奠祭山和一年一度的“甫玛突”都有借助神灵保护森林的意义。

很多哈尼族村寨的周围，都有成片成片郁郁葱葱的山林，先民们迁徙到三江五河的高山纵谷间，凭借森林环境“棲木而巢”、“橡粟为食”，利用森林植被的屏障得以生存繁衍。森林使人们拥有了栖身之所、生活之源，因此哈尼人热爱、尊敬森林，与其结下不解之缘。他们把森林看成是全寨人的保护神，是美好、幸福和希望的象征。并以“甫玛突”（祭竜神）的原始祭祀活动代代相传，

以此来保护森林，保证水源不枯，梯田得到灌溉。

云南社科院王清华研究员在其著作《梯田文化论》中，这样记述哈尼族竜林对生态事项的积极影响。哈尼族认为：有山就有水，有水就聚人；水来自于山，山靠林养良。很显然，这是哈尼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亦是对哀牢山自然环境中森林与水的关系的正确认识。哀牢山“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梯田之水源于森林的事实，使从事梯田农业的哈尼族对森林永远怀着浑浑的敬意和无限的崇拜之情。哈尼族每个村寨的旁边都有一片丛林，视为神树林，哈尼语称为“普麻俄波”，“普麻”即寨子，“俄波”即“一片树林”、“萌发之根”。“普麻俄波”全意为建寨的神林，象征护寨神灵，喻意生活于此的哈尼人能像“普麻俄波”一样生命强壮、兴盛勃发。同时，“普麻俄波”亦有“丛林即村寨”、“丛林大寨子”之意，隐含着丛林就是家的意思。这实际上表明着神树林与哈尼族远古的丛林生活及迁徙定居哀牢山的丛林曾是哈尼先民的“家”和巨大的自然庇护所。大森林给哈尼族先民提供了遮雨避风、动植物食物等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需求，同时大森林的生动活泼、变幻莫测和阴森恐怖的气氛又造成先民们对其怀有巨大的神秘感和畏惧感。大森林施以恩惠，又投以威吓，在先民们的原始思维中，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神灵。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和发展起来，使哈尼族对大森林这个庇护所和保护神既感激不尽，又崇敬不已。正因为对大森林庇护所和保护神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崇拜，哈尼族“无论搬到哪里，最要紧的事就是在立寨附近的山林中认定一棵标直锥栗‘树’，如果没有，便要从别处挖迁过来。‘林’中不许放牧，更不许砍伐，甚至女人都严禁进入。”这表明大森林庇护所血脉不断，神灵仍然保佑哈尼族。尽管多样具体的植物崇拜已经淡化，但整体的森林崇拜，仍以神树林（竜林）的方式延续了下来。

王清华研究员认为：“哈尼族的神树林一般有四处：一是在能够同时眺望几个村寨的山头上，选一片茂密树林，作为这一地区的总管树林（各地神林不同）；二是上述的村寨旁的的神林‘普麻俄波’，为一村一寨神树林；三是村寨下方的神林‘即主主波’，是镇压恶兽，严禁其危害禽畜的丛林；四是位于距村寨的半公里路程的山道旁的‘咪刹刹波’，它是人与野鬼分界的丛林。哈尼族村寨的这四种神树林，囊括了所在区域的水源林和村寨林；哈尼族村寨

密集，神树林实际上就是哀牢山森林的主要部分。哈尼族对神树林的崇拜、祭祀、严加保护和对人们的种种限制，一方面使人心安定，生产生活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则有效地保护了森林和水资源，使梯田农业得以顺利地发展⁴。”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位于哀牢山中下段，北回归线穿县城而过。三江五河（即把边江、阿墨江、泗南江、他郎河、布竜河、坝干河、那卡河、杓木河）纵横交织着这片土地，使其山势陡峻、山高谷深，重岩叠嶂、峰峦起伏。又因地处低纬度山地，北回归线以南占三分之二，为亚热带气候类型。太阳高度角大，辐射较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影响下，给森林的起源、生长、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江河两岸亚热带季风雨林覆盖。山中部为思茅松占领，林中有虎、豹、鹿、猴等珍稀动物也经常出现，这些丰富的森林资源，为生活在“太阳转身的地方——墨江”的哈尼族提供了无比丰饶的生活生产资源，这里是哈尼族用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在群山间退出来的美丽富饶且崭新的诺玛阿美。

总而言之，哈尼族的竜林是哈尼人民用神性倾注生命力量保护下来的良好自然生态圈。几百年来，哈尼族以原始崇拜、顶礼膜拜，对自然无限敬仰的人性意识，保护与平衡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我们从哈尼族祭竜的虔诚祭祀礼仪中，解读出来的不是荒诞和愚昧，而是哈尼族在保护森林、保护自然、保护生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礼仪。在哈尼族山区，往往形成“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在这四度同构的生态系统中，森林（很多哈尼族村寨的竜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江河之水的来源，也是梯田灌溉之水的根本保证，还是保寨平安、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的寨神（竜神）的栖居之所。因此，哈尼族的建寨先立神（竜神），年年不断地对竜神进行祭祀，对竜林倍加保护，就是哈尼族保护自己，使得自己能够在天地间潇洒生活的最朴素的真实思想反映。对竜林的崇敬和倍加保护，形成了“自然本位”和“天人合一”的哈尼族古朴的哲学观念。由此可见，哈尼族敬奉天地，善待大自然，实际上是古朴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朴素反映。世代对竜林进行保护具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并由此而生发的传统民族文化事项也是

4 王清华：《梯田文化论》（第1版），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丰富多彩的。

四、结语

墨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立体地貌、立体气候和与之相适应的立体分布植物群落，构成了植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的优良自然生态系统。这样的自然生态系统不仅给神奇浪漫的墨江自然生命系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繁衍条件，使墨江成为“植物王国”，而且给世代生活在这里的 10 多种民族提供了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存空间，特别是生活在这里的哈尼族，大自然为他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物质资源。在以山地农耕为主的辛勤劳作过程中，哈尼人又演绎了丰富多彩和蕴含深厚而神奇浪漫的哈尼文化。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也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为哈尼族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保护环境、维持系统的稳定成为哈尼族世代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传统。其森林生态系统的两大功能对哈尼族的影响最为突显：

1. 涵养水源的功能。森林通过对天然降水和地表径流的截流和吸收，能调节地表水的时空分布，涵养水源，被称为天然的“绿色水库”。这在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中尤为重要，墨江三江五河流域的不透水岩石层，使森林涵养的水源在山区随处出露，形成众多的泉眼，有效地调节了地表水的时空分布，保证了系统对水源的需求。

2. 减少地表径流侵蚀，保护土壤的功能。森林通过对地表水的截流，增加了地表水的土壤渗入时间，减少了地表径流，使地表径流对土壤的冲刷作用减弱，通过减少地表径流和截留径流所带的泥沙，保护了土壤，减少了水土流失，从而维持和保护了生态环境，使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保持稳定。

竜林是哈尼族传统的自然保护区，在墨江三江五河流域的哈尼族村寨里，每个寨子都有各自保护的竜林。面积从十亩、数十亩到百千亩不等，林木苍翠挺拔，山林郁郁葱葱，竜神树掩映摇曳。可以说，竜林是用之不竭的天然绿色水库，是哈尼族所耕作的梯田灌溉的直接水源来源。可以这样自豪地说：哈尼族祭祀竜神、保护竜林是绿色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传承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

典范。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王清华：《梯田文化论》（第1版），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7年卷），2008年5月24日于上海召开首发式报告会。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来稿须知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是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当代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范围涵盖一切与当代中国有关的研究课题，学术领域不限。本刊格式：

1. 文稿一律采用中文简体，以 MS Word 编辑，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独段引言用“楷体”，采用 12 号字，1.5 倍行距，页码置于页尾右侧。

2. 文稿顺序：中英文篇名、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中文为先）、正文、参考文献。

3. 篇名：简明、确切地概括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一般不超过 20 字，必要时可以加副篇名。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和公式。英文篇名与中文篇名含义一致。

4. 作者简介：姓名、职称、工作单位、研究方向或者研究兴趣和邮箱。

5. 摘要：客观地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不超过 300 字，不分段，不用图表和非公知公用的符号或术语，不引用图、表、公式和参考文献的序号。英文摘要的内容与中文摘要相对应。

6. 关键词：反映论文的主题概念，一般标注 3 - 8 个，用分号隔开。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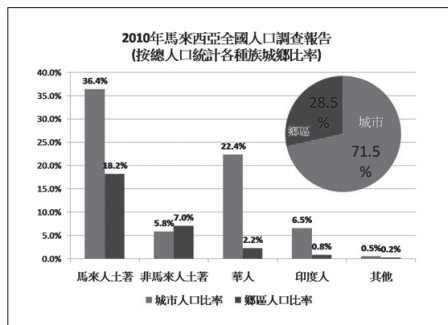
7. 标题：大小标题以一，（一），1，（1），（i）为序。

8. 脚注：是对引文出处或用于对文章篇名、作者及文内某一特定内容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采用 1 序号，通篇序号连贯，若脚注针对文中某特定词语，序号置于该词语右上角，脚注内容位于插入页正文下方。体例如下：

1.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第 262 页。
2. 西西：〈巴加斯·略萨作品的时空浓缩结构——试析《潘特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联合文学》，1994 年第 111 期，第 103-113 页。
3.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 年，第 9-19 页。
4. Voltaire: *Candidate and Zadig*.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168.

9. 图表：文内所有的图表皆以序号标明及排列，如：图 1、图 2、表 1、表 2。序号后应备注该图表的相应标题（如有），资料来源置于图表的下方。如：

表 1 2010 年马来西亚全国人口调查报告



资料来源：政府人口普查报告 / 作者制表

10. 参考文献：列于正文之后，中英文参考文献分开排列，中文在前，英文随后，采用作者姓氏字母顺序。如：

1.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 年。

2.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
3. 西西：〈巴加斯·略萨作品的时空浓缩结构——试析《潘特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联合文学》，1994 年第 111 期。
4. Voltaire: *Candidate and Zadig*.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11. 网络资料：作者：〈资料名称〉，《网站刊物名称》，资料发表日期。网址。取用日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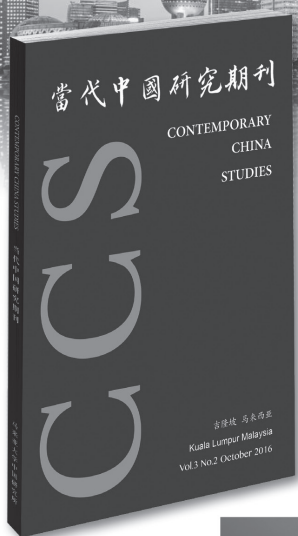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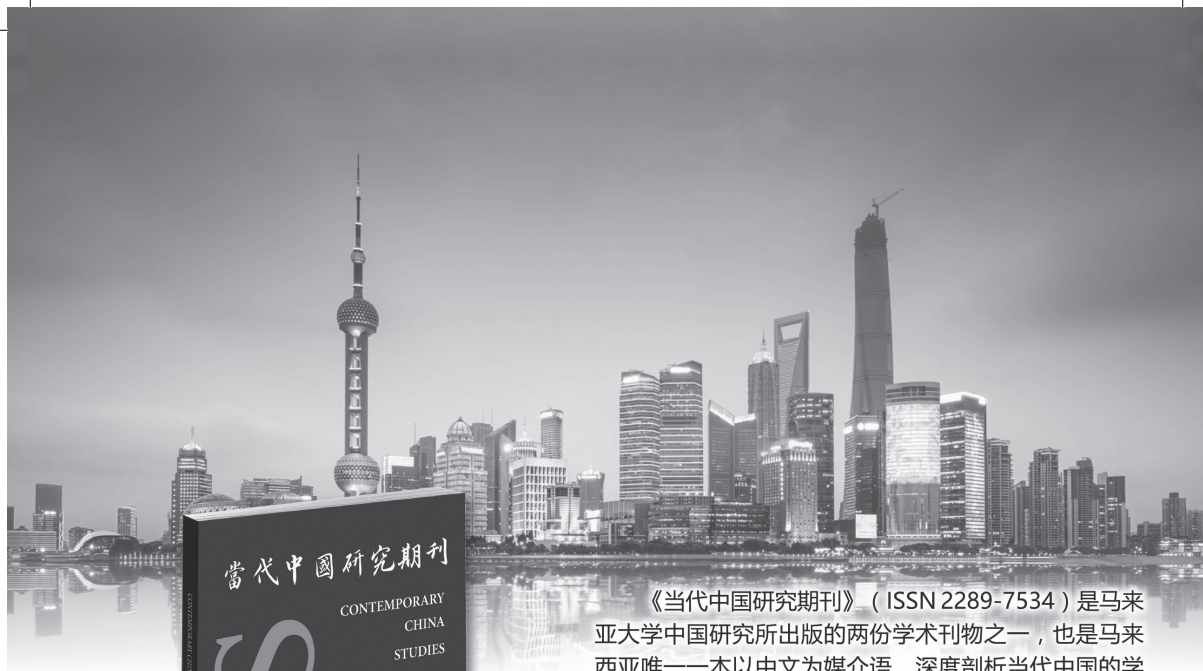
张铁：〈人民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人民网》，2011 年 12 月 22 日。网址：<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6677909.html>。取用日期：2017 年 5 月 13 日。

12. 联系方式：包括能够与作者及时沟通的电子信箱和电话。

竭诚欢迎广大新老学者踊跃投稿。

本刊编辑部电子信箱：ccs2014ics@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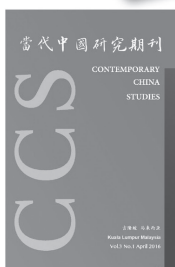
地址：《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ISSN 2289-7534)是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出版的两份学术刊物之一,也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本以中文为媒介语,深度剖析当代中国的学术期刊。

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和政府智库。本所成立于 2003 年,由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阿都拉提议创办,旨在成为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地区从事中国研究的领军机构,并成为沟通全球关注中国的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的重要桥梁。中国研究所定期出版两份期刊:英文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为 Scopus 所收录;中文期刊就是本刊——《当代中国研究期刊》(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本刊自出版以来已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尤其在海外华人学术界。刊内所收录的文章内容广泛,涵盖与当代中国相关的各个领域,投稿学者来自东南亚、中国以及港澳台地区。本刊坚持以努力追求学术创新、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的理念选取当代热门的中国研究文章,并以专业严谨的态度出版,获得学术研究界一致好评。本刊现向诸位学术同好邀约撰写稿件,任何与当代中国相关的论文课题,一概欢迎。本刊将继续努力成为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中文学术交流平台及展示中文学术文化的窗口。



**UNIVERSITY
OF MALAYA**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邮箱: ccs2014ics@gmail.com

电话: 603-7967 7288

地址: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